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8年11月15日第30期 总第240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40期

目录

【专稿】

阎长贵 我所知道的戚本禹

何 方 共和国成立初期外交上的两条路线

【何與懷評論】

1. 个人崇拜：要么坚决制止，要么加速度疯涨

2. 他是在以牙还牙吗？

——一个中国通已经开始但远未完结的故事

3. 《致命中国》对中国相当“致命”

【随笔】

周 实 那个时候写的诗

李南央 在美国看西洋景

梁沪生 独酌翁杂忆——亲睹李劫夫/感受山雨欲来

【述往】

韦文德 一个地主崽的一生（二）

——“四类分子”·市管会主任·贫协主席

【文摘】

何 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附：一、和陈启懋的通信

二、关于两场革命——同台湾学者钱永祥谈话的提纲

三、和许良英的通讯

【本刊声明】

【专稿】

我所知道的戚本禹

阎长贵



文革初期，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有三个活跃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人称王关戚），其中戚本禹最活跃，人称“戚大帅”。王力，我认识，但没有什么交往。关锋是我领导和导师，关系密切，2005年，我写过《我所知道的关锋》，发表在《同舟共进》。其实我和戚本禹的关系也很密切，在文革中，对我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就是戚本禹，并且是他推荐我做了江青的秘书（还是第一任），改变了（晚年戚本禹）我的整个人生。不论在文革前，还是在文革后，我和戚本禹都有交往。所以我有责任和义务写一写《我所知道的戚本禹》。戚本禹，1931年生，山东威海人。1949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2016年，在上海病逝，终年86岁。

一、文革前的戚本禹

戚本禹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上海，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诞生后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1958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开始整风运动，林克、戚本禹等八个年轻干部向上级反映中央政治秘书室存在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当时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不满。因当时反右运动已经明朗化，他们借反右运动对这八个年轻干部进行批判，称他们“反党”。毛泽东得知此事，用唐朝“八司马事件”的故事解救了戚本禹等八人。

1962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散步时偶遇戚本禹，戚向毛泽东直言了自己新近受到的冤枉，

毛泽东随即让秘书田家英进行调查。戚本禹得知毛泽东爱读史书，就开始关注历史书籍。

1963年，戚本禹写了《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峪庐、吕集义先生商榷》，认为这是一个革命变节者的自白书。该文得到了毛主席肯定和赞赏。1964年陈伯达把戚本禹调到《红旗》杂志任历史组组长，而还没开始工作戚就参加了《红旗》杂志和马列主义研究院（这两个单位都归陈伯达领导）混合编成的“四清”工作队到通县参加“四清”，戚分在宋庄公社翟里大队，任翟里五队的工作组组长，他们这个组经过一段工作搞出了一个所谓“漏划富农”，获翟里大队工作队的总领队邓力群的认可和支持。1965年12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评翦伯赞提出的历史主义的意见，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毛泽东称赞：“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二、戚本禹在文革中

1966年5月，戚本禹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文革发起初期，由于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主张“包产到户”等，遭罢免，原由田担任的政治秘书室主任由戚本禹取代，其职责主要为毛主席服务。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戚本禹是起草人之一。1966年，戚本禹在第7期《红旗》杂志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戚本禹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之一，名列穆欣、姚文元之前。1967年3月30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批判刘少奇。4月1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从此开始了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

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运动。

戚本禹在文革中态度热烈，行动积极，到处煽动文化大革命之风，点燃造走资派反之火。他发表了大量的讲话和谈话，助力文革——同时，也是研究文革史的重要资料。

1967年7月20日，武汉“七二零事件”发生。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等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及其大肆宣传，严重地造成了军队的混乱，毛泽东为了稳定军队，于1967年8月30日抛出王力、关锋做替罪羊，将他们隔离审查，三个多月后，1968年1月又将戚本禹直接投入秦城监狱（后不久，王力、关锋也关入秦城监狱），王力、关锋被关押14年，1982年释放。戚本禹被判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6年刑满释放。

三、戚本禹在刑满释放后

1986年，戚本禹刑满释放后，在上海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至1990年代初退休。退休后，他开始潜心研究学问，并勤于笔耕。先后著有《大人物的变态心理》（合著）、《先秦人物》、《两汉人物》、《三国人物》、《两晋一明清人物》、《论语今译》（合著），与关锋编辑一百三十多万字的《孙子兵法大辞典》（关任主编，戚任副主编）等。

四、关于《戚本禹回忆录》

戚本禹这本回忆录（2016年5月由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是坚决肯定和维护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仅坚决肯定和维护毛泽东，也坚决肯定和维护江青。这是他的根本立场，没有任何一点反思。他在这方面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然而，他毕竟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直接的最高领导机构）的成员，经历了一年多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他无疑是了解不少文革的实际情况的——只要他不隐瞒，不忌讳，实话实说，那他的回忆录是会给人们提供关于文革真相的、别人所不知道的不少素材的，这正是人们所希望和期待的。不能说，这方面的情况一点没有，但和人们所希望和期待的

差得太远了。我们举几个例子。

1. 戚本禹关于《五七指示》的回忆在网上发表时，引起很多人的注意，认为他这篇回忆对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对研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价值。戚本禹说，“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五七指示’……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还说什么：“文革期间搞的‘五七干校’”，“是防止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劳动，防止产生特权利益阶级的有效方法”。（参见《戚本禹回忆录》第401、403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数）戚本禹在文革后的50年，竟然还看不到一点“五七指示”以及依据它产生的“五七干校”，给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所带来和造成的种种痛苦和灾难。

2. 在毛泽东1966年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关锋在小组讨论时首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说法，受到陈伯达、江青赞赏，江青还叫关锋就这个提法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主席看了此信，同意这个提法，并把这信批给其他中央同志。到十月二日《红旗》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就公开采用了这个提法。

（459页、508页）固然，戚本禹在这里所叙述的也可以说是实际情况，但他掩盖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无数冤、假、错案。

3. 1967年1月4日，江青、陈伯达公开宣布打倒陶铸以后，成立陶铸专案组，周总理叫戚本禹任该专案组组长，毛泽东也批了（567页）。戚本禹任组长的陶铸专案组究竟干了些什么，他一句话也没说。

4. 关于田家英之死已经50多年了，其死的原因至今还有争论，有人说“他杀”（说是汪东兴的警卫员枪杀的），有人（包括田家英的女儿）说“自杀”，戚本禹肯定地说是“自杀”，应该说这是符合事实的。田家英为什么自杀，戚本禹说因为毛主席“不再相信他了”。毛主席为什么不再相信他了？因为他主张“包产到户”，并向毛主席说了假话。本来1962年刮“单干风”、毛主席正和这种主张斗争的时候，他叫田家英到湖南调查，田回京后本来应该先向主席报告，却先到刘少奇那里做了支持“包产到户”的报告。刘少奇鼓励和支

持他的意见，并要他向主席建议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他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做了，受到主席的批评。后来主席问他，这“包产到户”是你自己来说的，还是谁叫你来说的。田家英坚持说，是他自己的意见，不是别人叫他来的。（412页）江青曾指责田家英“一仆二主”。当文革还没正式开始的时候，田家英作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随从也受到审查，他觉得没希望了，于是就走上了自杀的绝路。

戚本禹这本回忆录也有不少失实和错误的地方，这也是应该指出来的，举一些例子。

1. 讲到“大跃进”时，戚本禹说：毛主席的错误没找到几条，却找出来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大量的错误，什么“亩产几万斤”，“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谬论，连普及“小高炉”都是刘少奇、邓小平最先提出来的。（383页）这就是说，“大跃进”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搞起来的。

2. 刘少奇说，主席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可能是指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他就反对毛主席。（392页）

3. 戚本禹说，1966年7月29日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在为派工作组错误进行自我辩解时提出了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453页）这不符合事实。这句话陶铸说“是一个小姑娘、中学生讲的”。（参见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13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是谁说的？》）

4. 关于江青保护知识分子。戚本禹说，江青很喜欢老舍的戏。江青问过我们好几次，究竟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对上官云珠，现在很多人说是江青迫害致死，胡说八道。从未听说江青说要批判或斗争上官，更谈不上迫害了，江青不止一次说过上官是旧演员中最优秀的。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斗争盖叫天啊？……江青是个爱才的人，而且她有眼光。她在文革中保了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有才能的人。……有一次，我向江青反映，广东把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了阴阳头，让她去农场养鸡。江青说，那怎么行。她还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呢。她让我去保她。江青还保了作曲家李劫夫……体委的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徐寅生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江青也让我去保护他们。这样的事情，

还有很多，很多（500——504页）。江青在文革中还保过很多老干部。中联部斗争王稼祥。江青知道了就跟王力和我说，叫他们别斗了。王稼祥在历史上对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王力和我向中联部和外交部的造反派做了工作，他们就停止了批斗王稼祥。江青和李富春的关系特别好。文革时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农口的造反派要打倒谭震林。主席说还是要保他。江青就让我给群众做工作。江青还帮很多老干部说过话，像谢觉哉、江华。连犯了严重错误的叶子龙，江青都为他说过话，说他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他给主席做过很多事，在转战陕北时一直跟着主席的。（531页）

5. 1967年2月16日，陈毅、谭震林等人大闹怀仁堂，在这次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当晚整理出一份会议记录，先向江青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江青觉得问题很大，他们立即找主席汇报。主席听了很不高兴，但未表态，而在张、王、姚整理的会议记录上批示：“退陈伯达同志。”（576——577页）戚本禹说，张、王、姚2月16日当晚会后就整理出会议记录，向江青和主席汇报，这不符合事实，这个会议记录是后来为开批判陈毅、谭震林等人的生活会才让张、王、姚他们整理的。（参见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13年第三次印刷《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唯一见证人》）

6. 《关于批斗王光美》，戚本禹说他坐镇钓鱼台和清华批斗王光美现场相联系（630页），纯属虚构；而直接按王力、关锋所传达的江青的意见布置的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王广宇所写《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参见《问史求信集》），才是真实的。

7. 关于王力、关锋受审查的时间。戚本禹说，（1967年）8月26日杨成武从上海回到北京。当晚，在钓鱼台16号楼，由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了会，没叫王力、关锋参加。会上，总理传达了主席的指示，批评王力、关锋的错误。说他们的主要错误，一是鼓动在外交部的夺权；二是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接着总理当场宣布了主席的决定，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对外则称“请假检讨”。随后，叫来了王力、关锋。在向他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会议的决定以后，总理、陈伯达、

康生、江青对他们做了批评。随后，江青就叫我把他们两个带离会议室，把他们送到已选好的钓鱼台2号楼。去前，我特意问了总理，给他们两个什么待遇？总理说，还是首长待遇。把他们安排好后，我又回到会议室，向领导做了汇报。总理对我说，你有空经常去看看他们，关心一下（663——664页）。戚本禹在这里说的王力、关锋受审查的时间不对。按王力本人的说法，他们被审查的时间，不是8月26日杨成武从上海回来的当天晚上，而是8月30号晚上。

8. 戚本禹说：关锋的学生阎长贵（我1961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师从关锋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重新出来工作后却把江青骂得很厉害。关锋叫他别骂江青，阎长贵不接受，关锋批评了他，两人从此不来往了（671）。这完全是胡编乱造。文革中，从1967年1月戚本禹把我推荐给江青当机要秘书，仅一年，1968年1月江青就诬我为“坐探”，把我投入秦城关押七年半，接着又流放到湖南西洞庭农场五年，1979年我以受江青诬陷迫害的名义平反，重新调回红旗杂志做编辑。文革后，1982年关锋从秦城监狱出来后，我和他都住一个院，我住1号楼，他住3号楼。当时组织嘱我少和关锋接触，我是严格遵守了的。1988年因遇林青山写了《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甘肃人民出版社），所谓江青机要秘书该书虽然用的是“阎昌奎”，实际这是我名字阎长贵的谐音字；此书编造多多，我和他打官司（胜诉）。此后我和关锋开始接触，一直到他2005年逝世，我和他关系很密切，他有什么事都找我，我也经常去看他，和他讨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他明确告诉我，我是他最信任的一个学生。我写关于文革的回忆录，本着“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的古训，不论对谁，包括对江青，我都是这样。和戚本禹说得完全不同，有一次关锋跟我说：“江青关你七八年，你没说她什么坏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关锋这样说。

2005年我写了《我所知道的关锋》30000多字的长文，其中也包括我和关锋的关系，发表在同年的《同舟共进》，大家如有兴趣和需要，可参考。

这是我对《戚本禹回忆录》看法，是否妥当，敬请知情者批评、指正。■

2018年10月

【专稿】

共和国成立初期外交上的两条路线

何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起，就存在着两条外交路线。张闻天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遭到批判，陈毅在接着召开的外事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认定：外交政策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路线和做法，一条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和做法。

陈毅对共和国成立以来两条外交路线的划分，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只是颠倒了两者正确和错误的定性，也被后来党中央的决议所推翻。中共中央1981年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指明，1959年在庐山举行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等于从反面说明，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主张和意见是正确的。而对张闻天来说，自然包括以他为代表、受到陈毅批判的外交路线。

两条外交路线的基本区别在于：毛泽东认为，世界仍然处在列宁所说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即战争与革命时代），因此战争不可避免，革命必然到来；只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根据这种形势估计，他制定的战略方针就是：积极推进世界革命，全面准备迎接战争，即所谓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张闻天则认为，战争打不起来（按他的话说，不但应当争取持久和平，还应争取永久和平），而且也并不存在世界范围的革命形势；因此，我们应当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对外坚持革命不能输出，把和平共处定为外交的总方针。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我给张闻天起草了一篇《论和平共处》的发言稿，可是没让他讲（此文后来收入《张闻天文集》四）。当时，他拉我一起去找周恩来，准备问他对稿子有什么意见，好让我记下来回来修改。不料周恩来并不接稿子，只说，国际和外交问题已安排陈老总讲了，你就不必再讲了。张自然

无话可说。看来不让张发言和出头露面，是“八大”的全面安排。否则，代表大会上有那么多的代表发言，却不让一个现任政治局委员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已确定将任下届政治局候补委员、早年还出任过总书记的张闻天做个发言，实在没有多大道理。

简单说来，两条外交路线可以分别称为世界革命路线与和平共处路线。

世界革命路线是党处于革命党时期制订的。在党成为执政党后，对外理应转奉和平共处路线。周恩来1953年访问印度时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接着就以之为我国外交的宗旨。但由于毛泽东把执政后的党依然视为革命党，对内对外都奉行要持续进行革命的斗争哲学，因此只把和平共处当作一种策略，甚至只是一个口号。是以世界革命还是以和平共处为外交路线，在中国领导层内暗中存在分歧，在中苏大论战中更成为中苏两党的一大争论焦点。

党中央领导人全都信奉世界革命。只不过是按世界革命原则还是按国际关系准则从事国际和外交活动，领导人之间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别。

共和国成立初期，负责外交工作的主要是周恩来和陈毅。周恩来在思想上倾向张闻天，在实践中执行的是毛泽东路线。当然，在中国的领导体制下，张闻天在行动上也只能遵循毛泽东路线。¹

周恩来在1949年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说，“国家机关是阶级斗争武器，对外功能就是联合各兄弟国家，联合各国被压迫的人民，反对敌视新中国的国家。”但几年之后，周恩来就有了新的提法。1952年4月他在外交部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除了美国，区别不同国家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而不是国家的阶级属性。周恩来1953年访问印度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明确表示革命不能输出。同年11月，他在外交部全体干部大会上重申革命不能输出。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和平共处等问题上发生分歧后，革命外交又成为主流。周恩来再次转变，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讲，世界革命中心转到了北京，中国

¹ 张闻天多次表示，我国推行的是和平共处外交。但1958年2月在外交部的务虚会议上，他的说法大变：“中国今后的对外政策应该向革命化方向发展。斗争是绝对的，冷战是不可避免的，妥协是相对的，暂时的。”

要当仁不让，见义勇为。1965年5月21日在中央军委讲话，说准备战争早打，大打，帝修反联合打核战争，准备两面打。

直接参与对外事务并有影响的人物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和和中联部长王稼祥。王稼祥和张闻天的主张比较接近。他1955年3月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中国革命的理论经验，对亚洲各国兄弟党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但是假如我们教条主义地搬到外国，那是非常危险的。”王稼祥1962年更是明确地不赞成在国内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还要大反帝、修、反和大力支援世界革命，于这年2月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信，郑重建议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对印度应该缓和一些，对外援助应该量力而行。王稼祥的这些主张也反映到他同年3月到6月主持起草的中联部文件和派团参加7月莫斯科裁军会议的方针中。当时的中联部工作人员王力在回忆录里谈到，王稼祥是先找刘少奇深谈后才写的信。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没有对这封信提出过不同意见。因此，从中央领导人对王稼祥这封信的态度中也可看到在外交上暗中存在着两条路线，当时王代表的是多数领导人的看法。

陈毅是毛泽东外交路线的忠实履行者。在这方面，毛泽东给了他充分的肯定。在1972年1月10日的陈毅追悼会上说，“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做了结论嘛……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

陈毅一就任外交部长就鲜明地提出要推行世界革命外交。1958年5月，他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且要促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新中国的外交也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

陈毅率先出面批判王稼祥1962年2月提出的主张和之后的做法。他同年9月14日在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小组会上发言，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这种思想是错误的，这股歪风主要是三年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立场不坚定人吓昏了。现在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这个发言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在简报上批：“可看，很好。”后来，毛泽东把这一主张归纳为“对帝修反要和一些，对世界革命的支持要少一些”的“三和一少”。

文革中，康生更把它上纲为“三降一灭”。

1965年9月12日，陈毅举行的那次震惊中外的记者招待会，是全盘照搬毛泽东的内部讲话。毛泽东1965年3月19日会见在中国常住的美国专家柯弗兰、艾德勒和爱泼斯坦时说：“我们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准备印度、日本、菲律宾、南朝鲜、蒋介石一起来。”陈毅的说法是，“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美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

下面简单归纳一下两条路线的内涵。

和平共处外交路线是：首先应当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即大力发展经济；对外同所有国家和平共处，搞好关系；推动国际形势缓和，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不搞革命输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对外开放，学习外国的长处；同西方国家建交，不完全对苏联“一边倒”。这条路线的最大特点是对当时民族主义国家的定位，就是应当认同它们在独立后把建设、而不是把学中国闹革命定为第一要务；在外交上要把它们看做中国的直接同盟军，而不是把它们视为反动势力和输出革命的主要对象。

世界革命外交路线是：以推动世界革命为外交的任务和目标；主张输出革命，一有机会就干涉别国内政，特别是近邻的小国和弱国的内政；愿意看到国际形势紧张，不愿意看到缓和，有时甚至还制造点紧张；实行闭关自守，提出“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路线要打倒帝、修、反。其中的反，就是把民族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以印度的尼赫鲁为代表，都列为反动派。执行这条路线只能导致我们，事实上也确曾造成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孤立。

毛泽东是一位忠诚的列宁主义者。苏联一直在输出革命，常年在帮助别国的革命和革命党的活动上花大钱。毛泽东也按这一条办。他还参与世界革命的领导，也为别国的革命出钱出力。中国很早就参加了设在布加勒斯特的一个基金会。苏联在里面摊钱最多，占三

分之一；其次就是中国，占四分之一。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就靠这些钱开展活动。

毛泽东早有领导殖民地和亚洲国家革命的想法。还在1936年7月，他在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已经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中国革命得到全力发展，那么，许多殖民地国家的群众将追随中国的榜样。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书中提出，他的这个理论适用于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1948年7月，毛泽东向联共（布）中央派驻中国代表科瓦廖夫谈到同东方共产党及其他政党建立关系的问题。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向米高扬提出建立亚洲国家共产党局即东方情报局的问题。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在苏联和斯大林多次谈话。在他7月4日递交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的经验“对于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可能是很有用的。”斯大林的回应是，他支持这片地区的革命运动由中国领导的想法。斯大林7月30日对刘少奇说：中国应该更多地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帮助民族民主运动。他们这几次谈话，就在中苏两党之间确定了分工：苏联更多地关照欧洲即整个西方，亚洲、东方的事归中国负责。实际上就是苏联管发达国家，中国管殖民地半殖民地。斯大林还说，“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希望中国今后多负担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毛泽东欣然接受了这种分工。

中国要当亚洲革命运动的领导并且发挥作用，很快就在1949年11月北京举行的亚洲和南太平洋工会代表会议和亚洲妇女会议上表现了出来。刘少奇坚持亚洲的工人和妇女组织应该开展反帝武装斗争。这个主张同与会的苏联代表产生了分歧。刘少奇会后向苏联驻华代办报怨说，会议上的亲苏派对亚洲的特点了解不够。而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则向斯大林报告，刘少奇在会上的发言稿是清楚的证据，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在谋求这个地区的统治地位。1949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又向斯大林具体提出了以中国革命经验为指导、推进亚洲各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革命设想。

其实，这时中国党在总的方面仍然完全听命于苏联。前面提到的刘少奇1949年7月4

日的报告，在谈到两党关系问题时就正式表示，“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即联共（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国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所以当斯大林健在，共和国又刚刚成立，毛泽东还不可能产生取代斯大林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想法。有相当一阵子，毛泽东已经满足于“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的地位。就这样，中国要管的已经是一大片。而且就是在亚洲推进世界革命，毛泽东也是继续尊重苏联的统帅部地位的。朝鲜战争就是在苏联、中国、朝鲜都致力于推进世界革命的背景下打起来的。当然，关键是金日成想尽早统一朝鲜，当整个朝鲜的领袖。只不过他首先要看斯大林的态度：是否同意他出兵南朝鲜。斯大林则要考虑让中国在这里面起什么作用。这里先不谈斯大林对朝鲜半岛的战略策略考虑，毛泽东的想法却是很明确的：中国革命胜利不能到此为止，要把胜利成果扩大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只不过一时还只能限于亚洲，首先是朝鲜和越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太远，还够不着。

同为国际主义者的金日成和胡志明也都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下一步理应由苏联和中国帮助他们取得胜利。但金日成既看不起中国，也对中国有疑虑，所以一开始只想依靠苏联把南朝鲜拿下来，并不愿中国出兵相助。他在关键时刻不能不找中国帮助，也是在斯大林叫他这样办之后。毛泽东倒是早已准备挑起领导亚洲革命的担子。不光对朝鲜，对在越南推进革命，都表现出很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毛泽东带头在亚洲推行世界革命，多少有点儿一头热，起码比要帮助的对象热。帮助朝鲜是这么个情况。后来帮助越南又是。胡志明也是不愿中国作战部队开进越南去的。在抗法和抗美战争中，尽管中国一再提出可以派军队去，公开声称愿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但越南没有答应，只接受大量物资供应和要求我们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和后勤部队。带有决定性的奠边府战役，越南也只要求我们派军事顾问，而没有要我们派出作战部队。罗

贵波、陈赓就是那个时候作为顾问先后到越南去的。

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是要一路打下去。先帮助朝鲜后帮助越南，同时鼓励其他东南亚国家按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办事，搞武装斗争。

在东南亚，我们当时输出革命的办法，一个是直接派人去；另一个是指挥他们自己干，特别是利用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其中主要骨干是华侨，指挥起来也方便。

直接派人去，缅甸是个典型。在抗日时期和日本投降后，缅甸共产党同后来的政府领导人昂山、吴努、奈温等本来是合作的，后来分裂了。不久缅共本身也一分为二，由“左”倾的德钦梭等一批人另组红旗共产党。缅共在领袖德钦丹东遇害后，接替的领导人是长期住在中国的德钦巴登项。我们对这一派缅共支持到了什么程度呢？派出军队在中缅边境缅甸境内为他们开辟了几块根据地，组织了武装力量。他们的一切供给，从粮食、服装到武器，都从中国运过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邓小平接受李光耀的意见，停止输出革命。缅共当即失去供给来源，只好在当地种植鸦片换钱。靠种鸦片维持的共产党力量，最后还是完全解体了。

指导当地人干的，例如马来亚和印尼。东南亚有些国家本来已经有了和平局面，中国却在那里鼓动武装斗争。以陈平为首的马共，本来已同当局谈判和平相处，我们却指示他们走中国道路，进行武装斗争。武装斗争才弄起来，1954年举行了日内瓦会议。中共和苏共一起转而要马共走和平道路。可是过不多久，又指示马共进行武装斗争。1956年毛泽东会见马共领导人，还赞扬他们坚持武装斗争，是英雄。1967年1月，毛泽东曾批评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说，1954年要马共改变斗争形式的意见没有请示过他。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上台后没过几年，中共要他们再走和平道路，而且随之停止一切援助，断绝一切联系。此后，马共也就再无声息。

支援印尼革命也过了头。我们和越南党联手，准备支持印尼共领袖艾地把印尼拿下来，结果失败。印尼和中国断交23年。

在泰国，共产党也曾起来进行武装斗争，但在中国停止援助后很快散伙。

在南亚，我们原来支持印度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1967年他们分为赞成和反对的两派。这时我们已经不再插手，随他们自己去弄。但进行武装斗争的人员却自称是毛派共产党。他们掀起的纳萨尔巴里运动声势浩大，武装人员达两万之多，至今已控制全国九万多平方公里土地，是印度政府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输出革命，就要干涉人家的内政。这一条延续的时间相当长。从毛泽东开始，一直延续到邓小平上台之后好几年。邓小平1978年3月31日会见泰国总理江萨时还在讲：“不支持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极大。如果我们改变了这个原则，就等于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面前放下了武器，连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格都没有了。”

开展对外关系，毛泽东着眼于世界革命，连和当时亚非拉大批民族独立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兴趣都不大，只看在那儿输出革命的机会多不多。为此，有时连断交都在所不惜。文革时的1967年夏，在中国出现了反对缅甸、“打倒奈温”的口号。当时毛泽东公开说，群众喊打倒奈温的口号没有什么了不起；缅甸要是和我们断交就更好，我们可以更放手地去支援缅甸革命。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缅关系还能不紧张？这导致两国中断外交关系三年。输出革命、露骨干涉人家的内政，要么建不成交，要么建交后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世界革命的口号是打倒帝修反。打倒哪一个都有问题，尤其是打倒“反动派”。被列入“反动派”的面就太宽了，几乎所有非共产党执政的民族独立国家的统治阶级和集团都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全都可以囊括进去。直接参与反对和打倒它们，那就是干涉它们的内政。例如我们曾用船只偷运军火和粮食、服装等物资给泰国或马来亚共产党。那时我们和西哈努克的关系好，可以通过柬埔寨把东西运过去。

既然是路线问题，那就要贯穿一切，既管国内又管国外。而外交本来就是内政的延续。毛泽东推行革命路线，对内对外相互配合，高度一致。

例如，打朝鲜战争就不光掩护了在土改、镇反、三反中的过火行为，还乘所掀起的反美浪潮，大力肃清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影响。这还是让民主党

派和受过美英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转变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态度、对他们实行打压的大好机会。志愿军大规模开进朝鲜后两天，周恩来就找民主人士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座谈抗美援朝问题，告诫他们：“一些人中存在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

在全国一片声讨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树立仇视、蔑视、鄙视美国观念的声浪下，1951和1952年在全国高等院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改造知识分子思想运动。当时的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专门发表文章，说自抗美援朝以来，大学教师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虽已“极大削弱”，但他们“仍浓厚地保存着英美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思想”。

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是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继续革命”路线的延伸。内政要服从世界革命的大目标，为此不惜做出民族牺牲。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是外交为内政服务，为国家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

既然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或继续，那就很容易在对内政策上找出两条外交路线的根源。

第一，在国内是主要抓经济建设还是主要抓阶级斗争。对经济建设，毛泽东谈得不多，劲头不大。他讲和做得最多的还是抓阶级斗争、搞各种政治运动，一直对发展军事、准备打仗的事情兴趣大。至于为争取在苏联之前进入共产主义所搞的“大跃进”，历史已经证明，那不是搞经济建设，而是对生产力和生态环境的大破坏。

第二，关于如何搞经济建设，是以农业和轻工业为先导，还是以重工业为先导。毛泽东虽然在1956年提出的《论十大关系》中排列了农轻重的顺序，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很快就被他发动的“大跃进”和提出的“以钢为纲”给冲掉了。他在1960年7月还说过：“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我们处于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十年搞一亿吨。”为了准备打仗，国内产业布局是在内地建立“三线”，因为打起仗来沿海会成为前线。可是三线建设谈何容易？那儿没有基础，得从沿海把工厂和技术人员搬过去。结果，沿海地区不但得不到建设，有些重要工厂还得向内地迁移，从而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破坏。

不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就使我们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那么，积累靠什么？只能靠剥夺和欺负农民。他们没饭吃还不能离家逃荒。有些农民就因为逃荒而被打死。“大跃进”和反右倾人祸造成的三年困难，全国饿死的人数竟高达三四千万，基本上都是农民。

和平共处与世界革命外交路线的差别极大。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两个代表人物张闻天和毛泽东在大方向上的追求并没有什么不同。对内都是要夺取政权，对外都是要推进世界革命。但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无论在国内任务还是在外交事务上，他们都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和毛泽东要把中国革命的经验推广到世界上去不同，张闻天认为，应当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让人民生活富足起来，这就是对世界革命的最大贡献。

在国内工作上，张闻天认为，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结束，共产党执政后的任务应该完全不同于以前，要把主要力量转入经济建设。东北解放后，他就提出，东北开始了进行经济建设的新的时代，“今后必须把经济建设的任务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他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写出对全国工作都有指导意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和建设方针的报告。报告内容后来被列入七届二中全会文献。他本人继续身体力行，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想把自己的精力用到参加国内的经济工作上去，只是毛泽东不允许。尽管如此，他一直继续关注国家的经济建设问题，在苏联当大使时还特别注意研究中苏经济合作中的问题、苏联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以及他个人对工业化方针的思考，写研究报告提请中央参考；任外交部副部长后，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就“三面红旗”造成的祸害的发言，真正显示出了他的真知灼见，实际上是对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批评，也因此倒了大霉。他晚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工作、文革中在肇庆被专政时，又撰写了有关经济问题的数量专著。

对于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应该如何执政，张闻天也和毛泽东的大权独揽、对内对外的事情全都由他说了算大不相同。张闻天主张实行民主，在中央实行真正的集体领导，重要问题按规定通过召开会议解决，反对个人说了算。他身体力行，有他在东北领导地方工

作时致力于政权的民主建设为证。

毛泽东认为和平共处同革命外交路线不相容。其实在中国，和平共处首先是周恩来1953年就中印关系提出来的，当时还把它说成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指针。毛泽东1954年7月6日却把“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说成是一个“口号”。他说，“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毛泽东明确表明，不能以和平共处而应以世界革命为对外政策总路线。他1957年11月22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介绍他访苏时和苏联的争论情况。据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一书中引述，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说：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因为这里还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问题；还有执政的共产党，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还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所以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这样，他就把和平共处外交放到了革命外交的对立面。

张闻天正是把和平共处作为一条路线来看待的。他撰文把和平共处提到我国外交主要任务的高度。他1957年1月15日在外交部部务会议上说，“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决不输出革命。革命与否，如何革命，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每一个国家革命的经验，对别国只有参考的价值，机械搬用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和平共处不是一个口号和策略，应用范围不限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而是长期适用于对一切国家的总路线。

在输出革命的问题上，张闻天和毛泽东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差别，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如何对待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和对运动领导权的看法和做法上。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曾断言，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是真正的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才能取得真正独立。共和国成立后头几年，毛泽东还把当时的民族主义国家看成仍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承认这些国家已经独立，把那里的当权派视为帝国主义傀儡。当无法否认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是独立国家时，却继续把他们看成是他们国内共产党需要

通过武装斗争取而代之的革命对象。后来在把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相提并论，成了“打倒帝修反”中的“反”即反动派，就不足为怪了。

张闻天则是另外的看法。他早就和我谈过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意见，说书中对二战后国际形势特别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估计不正确或者已经过时。他说，过去我们根据斯大林关于“十月革命”后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的理论，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再领导民族独立运动了，只能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领导，并且经过新民主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战后的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除中国等几个国家外，亚非拉各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独立后走的也是资本主义道路。所以这里要有个转变观念的问题，不能要求别的国家同中国一样，都来搞新民主主义。

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外交思想的大不相同，我在《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一书里曾做过如下的概述：“1. 关于和战问题。张闻天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不能‘把战争与和平的可能性看作是半斤八两’，‘不仅要争取持久和平，而且要争取永久和平’，促进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有利于我国经济建设。他也从不把战争与革命联系在一起，而是强调和平竞赛。‘因此，和平共处原则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同样主张争取世界和平，但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常强调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问题只在于‘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而且‘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即使‘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打上十年吧’，人类‘可能损失一半’，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完了仗再建设’。他后来提出的口号也是：‘备战、备荒、为人民’；‘保卫祖国，准备打仗’，甚至干脆主张‘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观察和估量国际形势，也是认为紧张更不利于帝国主义，因此还要主动制造点紧张，使他们不得安宁。

“2. 对世界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的看法。张闻天认为，二战后世界出现的是民族民主革命高潮，在相当时期内都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形势，资本主义还有较强的生命力。民族

独立运动一般是资产阶级领导，建立的也是民族主义国家，但都具有历史进步性。1955年他还明确提出，战后形势已改变了《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民族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论断。他一再强调‘革命决不能输出’，对民族主义国家，‘要向它们证明，我们并不想挖它们的墙角’。‘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外援上不能‘打肿脸充胖子’。毛泽东则倾向于推进世界革命，要充当世界反帝的头（‘要顶住美帝国主义的大肚子’）。1958年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修正，只涉及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在两个阵营中可能采取中间立场的问题，仍坚持这些国家要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向社会主义过渡，把当权的资产阶级列为‘帝、修、反’中的‘反’，号召和支援（按情况给予政治、经济以至军事援助）各国人民起来推翻它们。进而得出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成为一些国家所谓‘毛派’游击队的理论基础。

“3. 在对外关系上，张闻天主张面向世界，争取早日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共和国成立之初就曾专门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同英联邦国家等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发展经贸关系，推进文化交流，引进外国的资金特别是技术。他在共和国成立前所写东北经济构成的报告中即曾提出六种经济，内包括‘秋林经济’（当时苏联在哈尔滨办了个秋林公司。张以此名词代表利用外资）一项，后被毛泽东、刘少奇修改时删去，剩下五种。毛泽东也提倡面向世界，但多半是面向世界革命，实际上执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他先提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后发展为‘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他认为，同美英等西方国家迟点建交好，美国越搞经济封锁对我越有利，也不急于参加联合国（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曾提出，要参加得满足我们提出的先决条件：撤销宣布中朝为侵略者的决议，通过美国为侵略者的决议，修改联合国宪章。行不通，就和印尼的苏加诺提倡筹组“新兴力量国家”的联合国）。闭关自守和国内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曾使我们吃了大亏，共和国成立后30年经济没有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反而倒退。后来邓小平在谈及对外开放时也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

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4. 张闻天和毛泽东都提倡勤俭办外交，但张的要求更高，处处强调整节俭。毛却喜欢讲点排场，特别是总想出头，以大国和援助者自居。1953和1955年，张曾先后建议对国家庆典和外交礼宾应根据朴素大方原则和国际惯例进行改革‘或重新规定。如一年两次（‘五一’和‘十一’）检阅游行、国际和外交事件动辄百万人上街（庆贺、声援、夹道欢迎等）应予精简。外援要量力而行，适当减少，反对‘打肿脸充胖子’的对外援助。对外关系中的礼宾工作也须改革和简化，反对铺张浪费、弄虚作假、讲排场、摆阔气。但必须照顾国际法、遵守国际惯例，不能为所欲为。他的意见，有些被采纳了，如取消“五一”庆典的检阅等，但礼宾改革却遭到反对，没能行通。因为毛泽东实际上还是喜欢规模声势大些，特别是以个人好恶任意行事。如对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就故意弄得过分盛大（夹道欢迎等），对赫鲁晓夫则很不礼貌。对一些国家或政党，高兴时可以鼎力相助（如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不高兴时不惜断绝关系（如日共）。毛在外交上不愿受约束，认为可以‘无法无天’，藐视国际惯例，实行以我划线。例如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凡同苏联关系好、不接受毛泽东思想的，就一律归到‘帝修反’一边。结果只是孤立了自己。为了推行世界革命和打倒‘帝修反’特别是苏‘修’，对外援助也不断加码。除朝、越、阿、柬等友好国家外，对一些当时人均收入已大大高出我许多的国家如马耳他、叙利亚（还是主动提出）等，也要援助。致使外援达到顶峰的1973年竟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以上（二十年后的1993年降为0.36%）。但张闻天在外交礼宾和节俭上也不是没有缺陷。一是对交际活动如接见外宾、送往迎来等有些厌烦，不愿多交际，更少同外国人交朋友。原因除个人性格外，也可能是为了珍惜时间和避（里通外国）嫌。二是过分节俭，影响外交的开展。例如我们在驻苏使馆工作四年，张闻天没有一次派人或组织去外地参观访问，大家几乎都没有离开过使馆。一次几个人去列宁格勒访问，旅程食宿还是自费，实在显得有点寒碜。”

总之，张闻天按他的认识做外交工作，就是按国际关系准则处理好中国的对外关系，为中国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毛泽东是内政、外交一盘棋，以斗为主，借助中国革命领袖

的身份进而追求取代苏联的地位、成为世界革命领袖。发动“大跃进”（争取比苏联早进入共产主义），向亚非拉地区输出革命，争当世界反帝旗手，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本人也不讳言。

分别以毛泽东和张闻天为代表的两条外交路线，其影响在他们身后并未完全消失。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从陈独秀、张闻天到胡耀邦》，谈到这三位党的总书记的共同点或相似处。胡耀邦对世界大势和外交工作的看法，和张闻天相通。胡耀邦事实上早就认为时代特点已不再是战争与革命。他认为大战打不起来，不应该输出革命。他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为了不割断历史，提了一句“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从来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但他对国际主义的诠释完全不同于列宁和毛泽东。他说，国际主义就是“深深懂得中国民族利益的充分实现不能离开全人类的总体利益”，强调“革命决不能输出”，还把各国间的友好相处也纳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含义中。

2011年12期《炎黄春秋》刊载了《胡耀邦最后的日子》一文，介绍了胡耀邦对苏联东欧巨变的看法。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和对外政策的新思维，像一股巨浪将堤坝冲开了一个大缺口；东欧各国一系列的政治变革，对社会主义国家冲击很大；民主是世界性的潮流，势不可当。这些谈论是胡耀邦具有时代眼光的又一例子。这与按国内特定政治需要来解释世界变化和各国政权更迭的毛泽东传统迥然不同。时至今日，不论对当年苏联东欧巨变还是对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政局动荡，淡化他们国内政治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固有问题，强调西方和平演变在这些变局中所起的作用，不还是一种习惯思维吗？■

《何方谈毛泽东外交》第二篇

2011年8月口述，2012年3月成文，2017年9月修订

【何與懷評論】

个人崇拜：要么坚决制止，要么加速度疯涨

何與懷

7月11日，新华网一篇题为《华主席认错：中纪委曾严查了华国锋哪三项违纪？》的旧闻，很奇怪地被新华网重发。此文写道，1980年的某一天，群众来信向中纪委反映党中央主席华国锋的三件事：一是华国锋去江苏视察，外出沿途搞戒严，影响交通，造成上班族迟到，引起群众不满；二是中央党校的教授写信告发，有人把华国锋在中央党校作报告坐的椅子送到博物馆；三是山西群众写信反映，山西地方政府给华国锋交城的老家修故居，建纪念馆。这三件事反映到中纪委书记黄克诚那里，他认为这是搞新的个人崇拜，应该“查”！不过，还没查华主席就认错了。此事过后，中央书记处会议又决定，今后二三十年，一律不挂现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崇拜的影响。中共中央并下发一个通知，说今后在公共场所不得再悬挂华国锋的像和题词……云云。

无风不起浪。重发此文，当然不是某个编辑一时心血来潮，发思昔之幽情，自作主张。

显然与此相关，更有一系列大新闻。党媒《人民日报》7月9日出版的报纸出现罕见画面——头版所有标题均未见习近平的名字，中国各地各种社交媒体立时疯传帖子，配其截图，文字则是：“五年来，第一次只字不提‘习近平’的人日第一版。”前后那几天，各地各部门不断接到上头紧急通知，要求立即撤下一切含有习近平画像的海报和宣传品。7月12日，网传陕西省社科联发布的“梁家河大学问”研究课题被官方紧急叫停……诸如此类，奇了怪了。是啊，为何突然来个“叫停”？转变太大，令人不禁遐想。

就说说只不过两三个星期前要隆重开展的“梁家河大学问”课题研究吧。1969年，习近平16岁的时候，初到梁家河，至1975年离开，曾在梁家河度过七年知青插队岁月。前几年，习近平说了句梁家河有“大学问”的话，于是，一段时间，“梁家河”不仅成为一种热词，更形成梁家河形象，一些有关举措层出不穷，例如，弄了个“梁家河大学问”课

题。此课题发布后，陕西的大学就争先恐后极力置身于这可能青史留名的伟大研究。多达十七个选题方向，都把“梁家河”作为关键词，把习近平七年的梁家河知青生涯与“习近平思想的各组成部分”挖空心思搭上“逻辑关系”进行“研究”，例如，这生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地位、作用的研究；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逻辑关系的研究；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逻辑关系的研究；与习近平新时代三产融合思想的逻辑关系的研究，等等。就因为习近平那一段知青生活，由此《梁家河》相关书籍、《梁家河》音频、《梁家河》影视剧……等等都出现在全国大众视野。梁家河热潮席卷全国。

为什么把梁家河弄得如此火热？最根本的原因不外是大小官员以及相关人等政治投机，大拍马屁，通过推崇与习近平有关的梁家河向上面表忠心，希望得到高层的认可，让他们的仕途更上一层楼，或分得什么有形或无形的利益。

据说，拍马屁有十个手法，什么过犹不及、大音希声、先抑后扬、独具匠心、炉火纯青、八面玲珑、翻手为云覆手雨、登堂入室、春风化雨、返璞归真，等等，各有各的绝妙之处。历史上各种堪称范例的太多了。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吧。林彪同志提出，“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真是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林彪就是诸多同志中马屁拍很到位的一位，一句简单的话便充分表现了他贯彻执行的决心以及无限的崇拜，并得到最高的回报——被法定为接班人。现今，林彪同志已经折戟沉沙，身败名裂，但继承他马屁精衣钵的大有人在。梁家河热潮其实不过是小意思。君不闻，高层次的什么“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不是大行其道还被视为“看齐”意识的典范而大受赏识吗？在军中倡导实行“三个一切”（“一切重大事项由习主席决定、一切工作对习主席负责、一切行动听习主席指挥。”）与“三个凡是”（“凡是习主席提倡的坚决响应，凡是习主席决定的坚决执行，凡是习主席禁止的坚决不做。”），这些不是完全与当年林彪倡导“四个伟大”、“四个无限”如出一辙吗？事实上，这几年，在全党全军全国，在各行各业，在各级领导之间，出现“比忠比左”热潮，可谓一浪高过一浪。最近一段时

间，“习近平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之类的提法都已充斥人们的视野，“伟大领袖”“万岁”之类的口号都几乎呼之欲出，各路人等拍马屁都开始进入疯狂大竞赛！

去年我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作了一个历史考察。文中最后提到一个历史插曲：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中共元老习仲勋，大力主张言论自由，甚至提出制定一个眼下毫无可能制定的《不同意见保护法》。在一次会议休息时，他和中共另一位元老彭真进行过一次在中共党史上绝对称得上非常重要的“闲谈”。习仲勋说：“要有一个制度，有一种力量，能抵制住‘文革’这样的压力才好。”彭真接话后，习仲勋又非常无奈地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难哪！”习仲勋之忧可谓“中国之忧”；他提出的难题可谓“中国难题”。这个难题实在让人忧虑：在中国当今现实情况下，个人崇拜怎么避免？我在文中提出一个概念——“个人崇拜加速度”。的确，个人崇拜如不坚决制止，肯定加速度疯涨。在强大的加速度推动下，最终什么后果？只需回顾一下毛泽东个人崇拜带来的惨痛灾难便一清二楚。因此，如何通过措施和制度设置防范“卡里斯玛”式人物导致危机的可能性，成了当今政治学的一个比一般反腐败更重要的超大难题——权力腐败是最本质最要害的腐败，而个人崇拜是权力腐败的极致。■

2018年7月13日

【何與懷評論】

他是在以牙还牙吗？

——一个中国通已经开始但远未完结的故事

何與懷

大概二十年前，某天，在北京一个小旅馆，一个年轻的美国记者被警察团团围堵，几乎要动粗了。警察撕毁他的笔记，他也被迫删掉自己的采访内容，好不容易才得以脱身。

这个小伙子觉得整个事情本身很荒谬。他心里很纳闷：怎么会动用警察去干涉记者的报道？中国的法律授予过警察这种权力吗？而且，删掉那些采访的内容，当然在电脑上轻而易举，但是，你能从他的记忆中删掉吗？应该说，他已经纳闷多次。这种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似乎也习惯了。在他调查商业腐败案件时，他甚至被他不明身份的人其实是中国国家安全人员殴打……

这位先后担任《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的驻华记者，能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年轻人，在中国的八年时光中，曾经做过一系列的报道，但很遗憾的是，他的报道因为涉及“敏感”内容，大都曾经获得类似的“款待”。

这个人就是马修·波廷格（Matt Pottinger）——现今川普总统特别助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高级主任。波廷格的中文名叫博明，是目前白宫里面一名重要的中国通。正是他博明这个人，在背后帮川普总统策划了打击“中国制造 2025”的全新国家战略，并参与了对华贸易战。

今年 44 岁的博明出身美国上流社会，他的父亲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曾任职于司法部，后来在华尔街开办投行，业余创作小说。博明从小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就读于马萨诸塞大学中国研究系，学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据说，在大学选择这种文科冷门的美国学生，一般家境都很好，不愁吃穿，也不愁找工作的问题，完全按照自己兴趣来选择。

1998 年，博明利用他的专长，进入媒体工作。在中国和亚洲各地多年的采访经历，让他深刻了解到当地的体制、社会与文化，接触到底层社会残酷而又千奇百怪的挣扎现实。特别是在中国各地采访时被修理，令他受到了一辈子都没有受到过的委屈和耻辱。

后来，他看到了圣战组织斩首美国人的视频，又一次被强烈刺激。

他决定投笔从戎，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奔赴阿富汗作战。他当时年岁已大，身体条件也不好，要承受相当的磨难。退伍后博明投身政界，并迅速崛起。他自称由于“军人的使命感”，决定响应国家的召唤，放弃华尔街的高薪，加入到川普团队。

是什么样的动力，让这个出身富裕家庭的美国少爷走上这条道路？人们不能不想到，

这一定与他在中国的经历有关。后来有美国媒体这么总结：“在中国的压抑经历点燃了他心中的爱国主义激情。”博明辞去记者后曾回忆他当年一次的遭遇：“我站在马桶上，一群中国警察站在我旁边，一页一页撕毁我的笔记，接着冲进了马桶。”他关切的好像还不单他自己，他还直言道：“在中国的生活可以告诉你，一个非民主的国家能对它的公民做些什么。”这真是刻骨铭心的话。

这位博明先生现在开始摩拳擦掌大显身手了。观察家发现，他进入白宫后，在提交的备忘录里面，明确反对国务卿蒂勒森在公开场合使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八个字来形容美中关系。不像以前白宫喜欢请学院派的学者当顾问，博明作为一名中国通，完全是冲到一线工作的实战派，书本和教条绝对不会对他的判断产生任何局限。作为鹰派重量级人物，他也不拘泥于美国党派之争。

观察家还发现，不论是军中大佬彼得雷乌斯，还是川普当时的亲信班农，抑或是亲民主党的不少智库学者和中国问题专家，都对博明不乏溢美之词。事实已经表明，随着博明的经验和地位的增强，未来此人很有可能主导美国东亚战略。人们甚至认为，川普只是一个投石问路的开始，无论他是否能够连任，美国都将迎来长期的鹰派主政时代。就是说，博明这种人会长期在美国政界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

多少年来，到中国学习、工作、交朋友的西方人，往往都属于本国人里面的亲华派。毕竟，如果不是被中国文化深深吸引，也不会耗费多年精力心血攻克世上公认难学的中文，还跑到难以适应的相对落后的地区生活。可是，残酷的事实表明，当他们在国内受到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打击后，便有可能一改之前的友好和宽容态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及其后来华访问或工作的学者和很多驻华记者，都属于此类人，博明是其中的一位代表。

这是一个中国通已经开始但远未完结的故事。人们问：不知在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当年在小旅馆里围堵这位年轻记者的警察们该作何想？那些群殴暴打采访记者的人该作何想？那些为解决中美贸易争端夜不能寐的人又会有何感想？■

2018年8月7日

【何與懷評論】

《致命中国》对中国相当“致命”

何與懷

这部书，的确，足可以被不少人定性为“恶毒的反华著作”。

光看书名就够让人惊悸。英文原名：*Death by China: Confronting the Dragon —— A Global Call to Action*，译成中文是：“致命中国”，就是“中国导致大家丧命”之意；副标题是“号召全球对付中国龙”——如果成真，则是翻转过来对中国当然相当“致命”。

《致命中国》全书观点旗帜鲜明，文字毫不含糊，火药味十足。作者一上来就把中国的贸易做法定了性：重商主义加保护主义。它开宗明义，认为中国“快速变成全球最厉害的刺客”；认为“不道德的中国企业家用致命的产品淹没世界市场”，“中国采取非法保护主义掠夺美国的产业和工作机会”；认为“中国优势”来自“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全书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讲中国黑心产品；第二部分讲美中贸易；第三部分说的是中国扩充军力及间谍活动对美国形成的威胁；第四部分则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批判；第五部分提供与“致命中国”共存的保命之道。书中一一列举了中国用来消灭美国人工作机会的八般“武器”，计有：精心设计的非法出口贸易补贴网络；巧妙操纵和严重低估的货币贬值；公然仿冒、盗版和偷窃美国的知识产权；中国共产党短视地为了换取几块钱生产成本的优势而大规模破坏环境；超低的劳工健康标准、远低于国际规范的安全标准，导致大量工人罹患棉肺病、肢体伤残和各种癌症；非法关税、配额和从锑到锌等关键原材料的出口限制，对世界冶金和重工业取得更大控制权，作为战略的策略；掠夺性定价及倾销，把国外对手挤出关键的资源市场，接着以垄断性定价欺诈消费者；中国自豪的“贸易保护主义长城”——阻碍所有的外国竞争者在中国的土地上设立店面。如此一来，中国历年来得心应手、用之有效的八般“武器”全部被脱光包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美国人充分浏览，其心真是不谓不“恶毒”！

让反感此书的人很无奈的是，它的作者对中国的情况相当了解，论述范围相当广泛，列举的例证也确有其事。比如，书中在讲中国出产的黑心产品如何毒害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时候，作者从三鹿奶粉讲到地沟油和塑料米，从出口到美国的毒墙板讲到毒地板和毒玩具。美国的药房里充斥着中国制造的药品，从中国进口的水产品摆满美国的超市，这些鱼虾都是喂食了抗生素，中国的药品则含有环境污染的成分。在作者的笔下，可谓无毒不中国，令人不寒而栗。要命的是，这些论述证据翔实，连中国官方对一些事实也不避讳，有不少黑心产品确实实地是中国媒体自己揭露出来的。此书的真实性无疑对中国相当“致命”。

《致命中国》的书名呼吁全球一致行动来对抗中国龙。作者开出什么样的药方来治愈身染沉疴的美国对华贸易呢？该书的第五部分就是作者提供的与“致命中国”共存的保命之道。书中在个人选择方案、企业管理层决策、政府的政策措施三个方面提出了详尽的解决策略。列举的生存指南范围广泛：既有教导消费者在超市里如何仔细看商品标签，又有如何防范中国的商业间谍；既有因应中国在非洲殖民掠夺资源，又有如何在外太空与中国间谍卫星周旋。其中政府的政策措施层面就包括：推动国会立法，要求与美国进行自由贸易的任何国家必须放弃所有非法出口补贴；货币汇率需反映实况；要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符合国际规范的环境保护及健康与安全标准；开放能源和原材料的全球进出口市场、提供“包括媒体和互联网服务在内的自由与开放的国内市场”。在具体执行方面，这本书提出众多细致的措施，例如：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5%关税、制止中国公司窃取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缩小美中贸易逆差、弃用“中国制造”商品、将中国列为货币汇率操纵国……

这本被一些人定性为“恶毒的反华著作”的书，2011年一出版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书斋和校园，许多对华鹰派人士齐声喝彩，国会众议员罗拉巴克为此书写了后记。2012年，在大企业投资下，此书被改编为同名纪录片，作者纳瓦罗亲自导演，诸多美国政要甚至包括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都在影片中受访，名噪一时。纪录片虽然是书中观点的照搬，但是毕竟影响力要比原著大多了。总之，两者都对美国社会产

生了不可低估的政治效应。2015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就达3657亿美元之巨，制造业转移中国造成美国传统工业基地“铁锈带”的衰落有目共睹，所以许多美国人觉得《致命中国》的批判性显得格外有力，这从总统竞选中川普引用该书的论点而得到广大白人蓝领民众的热烈呼应中可见一斑。

2016年底川普当选总统后，不忘即时给予《致命中国》极高的评价。他说：“（该书）清晰的论点，周密的研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它很有远见地记述了全球主义对美国工人造成的伤害，并为复兴我们的中产阶级指明了一条路。”川普还特意为同名纪录片写了这样的推荐语：“《致命中国》说得很对。这部重要的纪录片用充分的事实、数据和洞察力，描述了我们与中国之间存在的问题。我强烈推荐给大家观看。”川普并不是2016年才读这本书。但他在当选上总统后才郑重发表对这本书的看法，而且极力推荐，可见他对这本书的重视程度。事实上，川普和这本书的两位作者——经济学家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他的学生、企业家兼作家格里格·奥特里（Greg Autry）——非常有缘，简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致命中国》为美国开的药方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白宫要换主人，美国需要一位既要有脑子，又要有脊梁，敢于对中国说不的新总统。川普的当选，正中作者下怀。这两人在川普竞选过程中就进入了竞选团队充当经济顾问。2017年1月，川普宣布成立“国家贸易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贸易争端策略问题并担任主席的就是纳瓦罗。另一位作者奥特瑞亦被委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负责交接工作。

今天，纳瓦罗就是美国对华贸易战的直接策划者！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对中国进行猛烈抨击和威胁，弹药都一一来自他的《致命中国》；就任总统后至今更进而把他在书中的建议和措施一条一条地实施着，简直把其视作美国对华关系的指南手册。也许也是上天作弄中国，纳瓦罗同川普结缘，还是中国的新华社“牵线”。纳瓦罗曾表示，他本来不认识川普，2011年《致命中国》出版后，他得知川普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称赞他的著作，两人方才开始通讯。总统大选时他们第一次见面，而且一拍即合。

《致命中国》在2011年出版，在2012年被改编为同名纪录片，都已经是六七年前的

事了。看来这些年中国有关方面对它们的出版和发放、对它们的轰动及所代表的思潮、对川普如何从它们那里获取灵感并付诸行动，都不当一回事。中国有关方面相当“沉着”，沉醉在胡鞍钢们关于“中国世界第一”的忽悠以及《厉害了我的国》的自吹自擂。如果再仔细扒一下，这个纳瓦罗其实还有更激烈的关于中国的一些著作：《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The Coming China Wars: Where They Will Be Fought and How They Can Be Won, 初版2006；修订扩充版，2008）和《卧虎：中国的军国主义对全球意味着什么》（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 2015）。也和《致命中国》一样，光看书名就知道内容有多么刺激。在《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中，纳瓦罗认为中国正在“寻求全球经济霸权”。他建议“应该与中国进行直接的经济对抗，包括制裁和边境控制——必要情况下，以军事行动作为支援……”今天中美关系走势，真的是被他不幸言中！而北京当局，却一直误认为纳瓦罗们只是美国个别的极端狂热但绝对兴不起大浪的说客而已；一直误认为川普只是一名在虚张声势的商人，只不过为了美国期中选举作作样子；与此相关，北京还错估了美国与欧盟之间拥有相同核心价值观的联盟关系，且不切实际地希望与欧盟组成一个针对华盛顿的联合贸易阵线。也许可以说，中国这些错判以及在其错判之下而已经做出和将要做出的应对，对中国才是真的致命！

在《致命中国》的结尾，纳瓦罗特别强调，作为一个中国通，他热爱中国文化，跟很多中国人是好朋友。他甚至专门在书的扉页留下一句话：

“献给所有的中国朋友们。希望他们有一天能自由地生活。在那一天到来之前，请大家多保重！”

有人已经指出了，与其说这是一种问候，莫如说这是一种提醒和担忧。这种问候，读起来五味杂陈、余味悠长。当然，会有许多人觉得，这简直“恶毒”透了。■

2018年8月11

【随 笔】

那个时候写的诗

周 实

前两年，有朋友告诉我，网上有一篇《当代著名作家文革时期作品大全（1966.5.—1976.10.）》。其中有一条涉及到了我，即使我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当代著名作家”：

1974年8月24日

《解放日报》刊出吴欢章的文章《诗贵立革命之意——读诗集〈红色的道路〉》。

《山东文艺》第四期刊登故事：王兆山《八百斤稻种》。

《四川文艺》8月号刊出诗歌：赵长天《为祖国站岗》。

《湘江文艺》第4期发表诗歌：长沙市工人周实《剧院里的回忆》。

确实，我确实写过这首诗。这是我第一次在省级刊物上发作品。那时我二十岁，在长沙市的一家街道工厂打铁。朋友很年轻，自然很好奇，问我那是首什么诗，当时写了一些什么。我说没什么好说的，再说我也记不清了，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四十多年了，这是老实话。那个时候写东西，都必须为政治服务，配合宣传教育的需要。朋友见我不愿说，也就不好再问了，此事也就放下了，我也懒得再去想。

前段时间看电视，翻报纸，读杂志，不知为什么，突然又想起那个时候写的东西，想起那首诗。于是，我就开箱倒柜，耐着性子找了起来，翻寻保存的旧杂志。皇天不负有心人，居然找到了，而且不止那一首，而且有三首，发在三期杂志上。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那时我写了一些什么。

第一首《剧院里的回忆》，发表于《湘江文艺》双月刊1974年第4期，那一年的8月：

台上，英雄形象如群峰屹立，
台下，革命激情似洪波涌起，
华铁臂猛然启开记忆的闸门：
九年前那夜不也坐在这排座椅？

忘不了呵，忘不了那场黑戏，
满台帝王才子，满台乌烟瘴气，
奴隶们被写成十恶不赦，
吸血鬼却满嘴吐着“仁义”！

钢牙咬碎心冒火呵，
当场就问：这是哪家文艺？
愤怒的吼声像山洪暴发，
险些儿冲垮了剧院的墙壁！

回到家中，心绪难平，
电灯下手捧《讲话》情更激。
指路的明灯照亮了前进的大道，
带茧的大手挥起了铁笔……

呵！文化革命一声霹雳，
红色舞台展现着崭新的天地，
革命样板戏如朵朵鲜花，
盛开在咱工人的心里。

看！“深夜翻仓”、“从容对敌”……
这呵，才是咱工人阶级的骨气！
今天，舞台已经由我们主宰，
谁要“克己复礼”，就对他“飞兵奇袭”！

好笑吧？好笑。确实非常好笑。但这确实是我写的，不好意思，就是这样，这就是当时的那个我，所写下的诗，我的处女作。这首诗发表在那期杂志的诗歌栏目“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赞”里面。那期杂志的打头栏目是“彻底批判湘剧《园丁之歌》”，然后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厂社挂钩赞”，“批林批孔怒火燃”、“军歌嘹亮”等。

第二首《“秘密读书室”门前的路上》，发表于《湘江文艺》双月刊1976年第5期，那一年的10月出版：

在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的环境中，鲁迅先生在上海市溧阳路租了一间房子，作为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的“秘密读书室”。

夜——风吼，雷鸣，雨急，
街头，一辆辆囚车呼啸飞驰；
你——含笑，挺胸，昂首，
大步地走向“秘密读书室”。

啊，多少个夜晚，这样的夜晚，
你的脚印从没有断过一次，
“秘密读书室”是座火的山啊，

你自觉地去进行热处理！

啊，多少个夜晚，这样的夜晚，

你的足音从没有停过一次，

“秘密读书室”是个火的海啊，

你要去“窃得火来”，照亮黑暗的人世！

如今，阳光已普照祖国大地，

入夜，夜校的灯火映红天际；

看！无数工农兵正踏着你的脚步，

去学习，宣传马列主义……

我现在已说不清当时我是凭什么认为鲁迅的那间租屋是他学习马列的地方，是他的“秘密读书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我的阅读学习的结果。当时，我所能读到的只是一些报刊的文章和宣传鲁迅的小册子。这一期的《湘江文艺》应该说是一期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的专号。该专号主要发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还有华国锋同志在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以及关于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还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社论《热烈欢呼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 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集团滔天罪行》《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等，还有湖南省会军民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的致敬电等，然后就是欢呼庆祝的文章和诗歌。然后，还有一个在《人民日报》社论《学习鲁迅 永远进击》率领下批判投降派“狄克”也就是张春桥的小专题。我的这首诗就编发在这个小专题

中。这期杂志的最后一面还登了两首向唐山抗震军民致敬的诗。应该说，作为一本文艺杂志，如此地配合政治形势，这般地配合宣传需要，真的已经尽力了。

第三首《红墙》，发表于《湘江文艺》双月刊1977年第4期，那一年的8月出版：

大井毛主席旧居，曾被白匪烧毁，仅存一堵残墙。重修毛主席旧居时，残墙嵌在新墙中，被称为“红墙”。

当我还带着红领巾的时候，
你的事迹就刻进了我的心窝。
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
想得很远啊，想得很多……

反动派煽起的冲天大火，
炼就你一身坚硬的骨骼；
岁月的烟雾怎能把你埋没？
你至今仍然巨人般屹立着！

井冈红墙，看到你啊，
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胆略——
刀光火影中，久经冶炼，
跟着毛主席，从不退缩！

井冈红墙，看到你啊，
看到了北京高大的红墙一座——

顶住了刘少奇、林彪卷起的黑风，
镇住了四人帮掀动的浊波！

井冈红墙，你是史书一页，
用无声的语言向后人解说：
是真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是伪装，终将被人民剥落！

这首诗是杂志的编辑约我写的。我没去过井冈山，怎么写？只能硬着头皮写，只能看看相关资料，看看别人怎么写的，然后再写自己的。写好后，发表了，不想麻烦也来了。编辑说我有抄袭嫌疑。我说哪里抄袭了？我说诗的前两段，井冈红墙那两段，谁都只能那样写，谁写的都差不多，但从井冈山的红墙写到中南海的红墙就是我的构思了，也是这首诗的诗眼。我说的是有道理的，此事也就放下了。这一期的《湘江文艺》主要围绕两个主题：一是热烈庆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学大庆，学大寨，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一是隆重纪念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五十周年。

从1974的8月到1977年8月，正好三年。这三年对中国来说，真可谓是天翻地覆。而这三年对我来说，也是我的人生转折。我从那个街道工厂，进了湘江师范读书，读书期间还被抽到乡下去搞“三分之一”，成了一名“国家干部”。毕业后被分到中学，教了半年初中之后，又被长沙市委调到市里面的广播系统参与创办广播电台。那时的我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的我，朝气蓬勃，开始了我的新闻采访编辑生涯，大步走向八十年代。偶尔还写诗，写与七十年代不同的诗。下面就选一组发表于改版之后的《湘江文艺》的《无题》。改版后的《湘江文艺》更名成了《文学月报》。发表拙诗的这一期是1985年第2期：

在一片灰灰的天空之下
在一片黑黑的土地之上
在一棵白白的梧桐树梢
有一片黄叶在风里飘摇
飘呀，飘呀，像一只小鸟
正瑟瑟直抖，饥寒难熬

难道它是想飞上天空
呵，那里多冷，似一座冰窖
难道它是想落到地面
呵，这里多湿，如一片泥沼
可是，如果还挂在树梢
终免不了挨那残忍的风刀

这——是何等凄惨的命运
叶子黄了还挂在树梢
一片黄叶在风里飘摇

二

在一个凄凉的深夜里
有一棵老树孤零零
北风铺天盖地呼啸
对它进行万般欺凌

它头上唯有寒月一轮

可是北风又卷来乌云

但它却只将枝叶轻摇

似在劝慰远方的儿孙

远方正是霞彩缤纷

三

春天了

它还是光秃秃的

尽管四周已绿得晶莹

它还是癞癞疤疤的

风从它头上温柔地拂过

听到了它的一声呻吟

它却以为风在呻吟

时代不同人不同，诗自然也不相同。从这三首《无题》小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杂志已经没有要求写作要为政治服务，要配合宣传的需要了。文学有了自己的追求。文字也有了自己的生命。

可是，我，为什么，此刻突然又想起，那个时候写的诗呢？ ■

【随 笔】

在美国看西洋景

李南央

帝国制度轮回十余次而基本结构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也不能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从而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小农经济的基础不变，诱导或威胁帝国制度发生根本变迁的利害格局就不能形成，王朝循环就不会终止。

——吴思《血酬定律》

我曾反反复复地咀嚼吴思先生的这段话，似乎“农业文明”是“帝国制度”的结构保障；“小农经济”是“帝国制度”的稳定基础；反正一个以农业为文明主导，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国家，一定会是一个“帝国制度”的国家。我对这个论点总有存疑。

美国开国时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他的国父华盛顿就是一个农人，卸任后在家务农直至去世。美国的很多州至今依然是以农业为主，而且都是各家各户分散地自耕自种。何以美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建立的不是“帝国制度”，能立身于“帝国轮回”的怪圈之外呢？在美国生活了廿多年，看了廿多年的西洋景，也想了廿多年。

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使我对这个问题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答案。共和党胜出的候选人唐纳·川普无论对美国的移民、经济，世界的核武，中东的乱局，张口就来，说他是胡说八道，一点不过。这家伙却越冲越高，真有点势不可挡的劲头。电视台天天转播选情，各台的主播对嘉宾们提出的问题各式各样，但总有一个共同的：万一川普真当了总统，他要乱来可怎么办？嘉宾们侃来侃去到最后都会说：不用担心。国父为我们建立了近乎完美的制度，这个制度制约着川普，他想胡来也胡来不了。

美国的制度建立在程序公正的基础之上，不参杂任何人情。最近奥兰多同性恋俱乐部

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枪击案，有民主党议员在国会提出禁枪案，但是议长以独立节将到，国会需要休会为由，不对该案进行表决。一些民主党议员就坐在国会的地上不走，说不表决就不离开。这一做法遭到了众多共和党议员的批评，认为是以感情代替程序，这样的先河绝不能开。否则每个人都以自己认为的“正义”、“道德”要求国会改变规则，将会使程序化为乌有。

我是觉得这次共和党的说法站在理上。作为个人，以正义和道德为自己行为准绳是一种高尚的人生选择，但是若将其作为治理国事、天下事的理念，则绝对要引发灾难。因为“正义”和“道德”是过于相对的概念，无法用法律条款予以界定，不同的阶层（包括治人者、被治者，劳心者、劳力者，儒家、法家，等等、等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性别；甚至同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同一家人中的父辈和孩子……对它们的诠释都会或多或少，乃至截然地不同。孰是孰非？谁能说服得了谁？一定要穷追出个最终正义，道德判决，就必然要落入“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帝国模式。而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智慧地避开了“正义”和“道德”这两面旗帜，他们选择了“程序的公正”作为治国的理念，引领着一群欧洲大陆的大佬们根本看不起的乡巴佬筚路蓝缕，不断自我纠正、自我完善地走到今天，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这一切与她建国之初和至今所具备的文明类别，经济基础全无关联。

今年民主党最后剩下的竞选总统二人之一的桑德斯，当年是反对小布什总统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可是我觉得他并没有说清楚那场战争错误的实质。那场战争的根本错误是布什打出的出师之名：“为了正义和道德”。我曾跟女儿在电话里有过长达一个多钟头的争论。女儿说：“萨达姆这个家伙太坏了，总要有人主持正义，管管他，不能让他这么胡作非为。”我说：“你认为萨达姆坏，还有人认为布什太坏了呢。谁的话算数？伊拉克一个弹丸小国，美国占领它当然是举手之劳，但是伊拉克人会认为美国军队长期驻扎在他们的国土上是‘正义’之举吗？如果有一天人家有了核武器，给你美国扔一枚原子弹用更强的暴力向你讨还‘正义’，这个世界还不乱了套？”我不知道在伊拉克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亲身感受到小

布什要在全世界声张他理解的“正义”的国策，造成了巨额的军费开支，转眼把克林顿留下的盈利财政变成了天文赤字，让美国的平民百姓陷入一九三二年经济大萧条后从未有过的困顿。

其实，即使小布什在国际事务上高唱“正义”之歌，在美国本土他还是老实实在地实施公正（justice）的。我很不同意将 Justice 翻译成“正义”，美国人使用这个词时，一般表达的都是“公正”之意，而不是正义（righteousness）。美国有一个收视率极高的电视系列片《法与序》（Law and Order），已经连续演了十多年了，直到现在，每个演出季还在不断地推出新片，很多的故事都有美国刚刚发生的真实事件的影子。我是这个系列片的绝对“粉丝”，有时周末有马拉松联映，可以定在电视机前整整一天。这个系列片不动声色地向民众传授着“公正”为本的理念。举其中一集为例吧。

一个当邮递员的越南老兵，独生子在伊拉克战死，可偏偏他递送邮件的那个纽约城区，一帮子大学生们老是集会游行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他和一个富家出身的大学生发生了口角。以后两人相见，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总对这个老兵出言不逊，嘲笑他们父子两代傻得可以，甘愿为政客们去当炮灰，也坏得可以，帮助糟糕的总统去欺负弱小国家的人民。他的儿子死了真是活该。一天，越南老兵在酒吧喝得高了一点儿，出门正撞上这个大学生，这小子又恶语相加，老兵一把薙住他的衣领，将他拽到个偏僻无人的地方，几拳揍死了。案子很快破了，老兵被市检察官控以蓄意杀人罪，老兵的辩护律师则以神经受到过度刺激，导致行为一时失控做无罪辩护。老兵是个第一代亚裔移民，一到美国就赶上越战，义无反顾地上了战场，战后回到美国本土取得美国国籍，结婚育子。他告诉儿子：美国是我们的祖国，这个国家给了我们一切，要知恩图报，为国效力。儿子高中毕业，适逢美国在伊拉克开战，便踏着父亲的足迹从军报国，当然也兼怀着个人的目的，希望退役后能用军队的资助完成高等教育。但是儿子没有父亲的运气，躺在覆盖着美国国旗的棺槨里被军用专机送回家乡。

辩护律师向陪审团煽情地叙述老兵两代男人的爱国情结，指责富家子弟兜里揣着父母

给的花不完的钱，在学校里不好好读书，百般生事，对为国效力的军人极尽侮辱之能事。想想失去唯一爱子的父亲以酒浇愁，正万念俱灰，心碎如焚之时，又被被害人无情地奚落，一时间大脑一片空白、丧失理智，才会误致人死。杀人的其实不是老兵本人，而是一个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神经错乱的患者。检方则向陪审团指出：经历过战场生死考验的退伍军人，根本不会仅仅因为话语的刺激就丧失自我控制能力，老兵并没有在酒吧门口对被害人施暴，而是将其弄到无人之地后方才动手，便是他头脑清醒，冷酷地蓄意谋杀的明证。被告父子为保卫美国安全作出的贡献固然可敬，但是他们并不因此拥有杀死反战人士的特权。依法判处被告谋杀罪，是你们每个陪审团员作为美国公民的责任和法理的选择。

猜猜陪审团表决结果如何？十二人投票，一致“not guilty”（无罪）！美国法律规定，杀人犯若被判无罪，同案不许二审，老兵当庭获释。检察官如丧考妣，瘫坐在椅子上久久站不起来，眼睁睁看着老兵和妻子与辩护律师紧紧拥抱，庆祝胜利，而无可奈何。死者的父母根本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当庭恸哭。我对自己说：对于死了儿子的父母，这有多么的不公平。儿子被杀，杀人者竟然被判无罪！但若判老兵有罪，就公平吗？为国家血洒疆场的男人，却拿不出供儿子上大学的费用，要靠孩子服够兵役换取军队提供的奖学金战后读书。富家子弟财源滚滚，不但可以不当兵受罪，还恣意嘲笑欺辱军人，穷人们的公平在哪里？这场审判，若以正义裁定，会永无结果，因为美国法庭没有一个可一锤定音的“第一把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这个案件中，被告的命运不是由显然的强者——代表政府的检察官所决定的，而是掌握在十二位平民陪审团员的手里，政府控制不了他们的头脑，奈何不了他们的决定，因此这个审判的程序对控辩双方都是公平的，因此无论结果如何，都是公正的！

美国电视还有一个“True TV”（法庭实案）的节目，我也非常喜欢。几天前，看了一个让我这个在中国长大的人无法思议的案例。

七十年代，加州某城发生了一连串谋杀年轻妇女的案件，从作案手法分析，警方认为是同一杀手所为，很快锁定了凶手，跟踪了他三年。但该犯非常狡猾，警方使尽解数，就

是无法取到他的作案证据。后来这个家伙搬到德州，加州警方只好通知那里的警察，让他们加倍小心地监视。不久，在该犯居住的地区，果然出现妇女遭强奸后被杀案件。无奈，警察仍然抓不到这个家伙的任何把柄，只能让他继续地逍遥法外。此人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终于失手。一天，他在一片公寓区跟踪一名年轻妇女多日之后，捕到机会，大白天在她住处楼下一拳将她击昏，然后拖进她的居室，准备施暴。没想到这个年轻妇女的一位朋友恰好来玩，当他用年轻妇女的钥匙打开公寓门时，和这个女孩子撞了个满怀。该犯立即把女孩儿的双手反拧在身后捆起，猛击她的头部。这个女孩子很聪明，假装昏死，该犯信以为真，把她扔在床上，自顾自地在浴室先行强奸那位年轻妇女。女孩子不顾双手反捆，从位于二楼的卧室凉台跳下，向临楼住户呼救。待到这个罪犯听到呜呜的警笛，夺门而逃时，已被警察四面合围。杀人惯犯知道被警察抓到的这次案情相对不重，两名妇女，一名被奸，一名被打，不是命案，受审时，坚不承认前科重罪。无计可施的警方，为了对死者家属有个交待，也为了凿死这家伙确实是那个系列杀手，要求检察官给了他“免于起诉之特权”（immunity）。有了这项保护伞，该犯交待了在加州和德州共杀了十三名妇女的罪行，并将埋尸地点一一指出。警方找到了所有受害者的遗骸，经DNA鉴定后通知了家属，让他们领回遗体，埋葬在自家的墓地，令死者安息，生者获慰。这十三项杀人罪可谓口供、证据俱全，但是检方赦免在先，不能食言，该罪犯仅以一项强奸、暴力罪被判得十六年监刑。事情的“荒谬”并未到此结束。六年后，加州一位受害人的母亲突然从报纸上读到，这个家伙将被提前释放出狱，原因是德州监狱人满为患，狱方需要释放一些轻罪犯人，给重犯腾地儿。该犯便趁机提出以十六年监禁罚一项强奸罪，量刑太重，要求被列入提前释放名单，居然获法官同意，批准刑满十年后予以释放。这位母亲简直无法相信这个事实：系列杀手四年之后就要重归社会，继续杀人。怒发冲冠的母亲立即联系德州和加州检方，两州检官方知出了如此大事，起而应对。想不到以为“小菜一碟”的事儿（piece of cake），查遍法律大典，居然找不到可以推翻法官决定，将该犯继续羁押的依据。眼看着时间如水流去，除非检方找到那免于起诉的十三项杀人罪之外的杀人证据，另立新案，再有两年，

这个凶残的杀人犯就是个自由人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加州检方取得电视台的支持，在黄金时段呼吁公众帮助政府将该杀人犯永远关在高墙之内。一名男子立即拨通了检方的热线电话，他告诉接线警官，十年前，他曾隔窗亲眼看到这个家伙在他住处对面的一个公寓门前，将一名妇女强奸后打死。那个人搬动尸体装入卡车时，野狼般的双眼正好对着他隔着百叶窗惊惧张望的眼睛，令他胆颤至今。罪犯开车逃离现场后，他从恐怖中醒来，向警方报案。可警察在现场什么也没找到，但是允诺调查。他说他从那一天开始，契而不舍地向警方追问查案结果，那个官僚的区警察办公室烦透了他，认为他神经有毛病，总以“我们仍在努力，尚未发现线索”搪塞。他刚刚看到电视，不禁大骂：“一群白痴！”这次州级检察官自然没有再把他当成神经病，而是视为明星证人。检方终于以残杀那名妇女为罪重新起诉该犯，审判结果是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我细细咀嚼这一看似荒唐透顶的个案的全过程，慢慢品出美国法律制度的相对完美。看似会错放一个罪犯，实际是将执法的法官和起诉罪犯的政府检方牢牢地拴在各自的阵营之内，使他们不能合成一股力量对付平民百姓，让弱势群体的权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减少了他们被强大的政府误判、误杀的几率。“宁可错杀一万，决不放过一个”与“宁可错放一个，决不错杀一万”，二者相较，后者的公正性不言而喻。

上边讲的两宗案子毕竟都经过艺术加工，不免包含了制片人的观点，有“灌输”之嫌。橄榄球星辛普森双杀案却是一个真实的案件，O.J.: Made in America 小型系列纪录片最近刚刚开始热播。这个案子十多年来，一直是众多美国法学院的经典教案。辛普森案决十周年时也出过一个纪录片，一位法学院教授在影片中接受采访时说：学生们问我，辛普森一案，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是唯一可能的杀人凶手，一个有良心的律师怎么可以为一名罪犯辩护？难道为了金钱就可以不讲正义，不要道德吗？教授说，我告诉学生，辩护律师的职责不是维护正义和道德，更不能以为被告无罪才为之辩护。在刑事诉讼案中，被告面对的是代表政府提起公诉的检察官，即或被告是个千万富翁，在检方拥有的财力和人力后援面前，也不过是大象脚下的一只蚂蚁。双方实力的悬殊，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审判的不公平。

但是美国的刑法规定均衡了双方的力量，拉平了检方和被告在法庭审判中的地位。检方的责任（burden）是要向陪审团证明被告有罪，而辩方的工作就是对检方提出的每一个证据、每一项证词提出挑战。只要陪审团员中有一人对检方的某一证据或某一证词存有质疑，不能百分之百地确认其可信，检方的指控就不能成立。一个好律师，在为被告辩护时应该忘记正义和道德，只需记住必须保证自己客户的公民权得到最大维护，绝不要被政府冤判。当问到这位教授，他认为检方何以打输了辛普森杀人这个板上钉钉的案子时，教授答道，检方输在两点：第一，他们的明星证人——现场勘查白人警官有种族歧视的前科，让辩护律师抓个正着。陪审团员对辩护律师质疑该警官现场栽赃虽并不全信，却也不能根本不信，成功地确立了一个 reasonable doubt（有理怀疑）；第二，让辛普森当庭试戴那个现场发现的血手套是检方最愚蠢的决定，此役之后败局已定。皮革被血浸过，自然收缩，辛普森用夸张的动作，显示自己是多么努力地将大手硬挤进那只手套，最终失败。辩护律师当庭对陪审团的说辞已成经典：“如果戴不上，就是戴不上，既然戴不上，就必须放弃指控（if it doesn't fit, it doesn't fit. If it doesn't fit, you must quit.）”。陪审团员虽然懂得手套会收缩的道理，但是“戴不上”造成的视觉冲击确实难以忽略，检方帮助被告完胜了另一个 reasonable doubt——手套有可能不是辛普森的，说不定是那个有种族歧视前科的警察丢在草地上陷害他的。

为了看辛普森的判决，那天上午我请假在家没有上班，十点左右，陪审团组长读出“被告无罪”的那一时刻，我为自己能够亲眼目睹这个必将成为美国法律史之经典辩护案例而激动。九个月来，电台几乎天天现场直播、重播当日的法庭审判，我实在烦透了那个傲慢无比的女检察官，等待宣判和宣判的那几分钟，电视镜头一直牢牢锁定在辛普森的脸上，他的面孔占据了整个画面，任何微小的表情变化都逃不过观众的眼睛。我要说，辛普森如果不是真正无罪，就是天底下最高明的演员，从那张脸上我读出的是“无辜”。但是理智告诉我，判决结果是错误的，正义未能得到伸张。这个案子花费了纳税人九百多万美元的资金，以失败告终。其实这样的结果几乎是必然的，法庭上架设的大大小的摄影、摄像

镜头让政府指定的检察官们过于分心，在镜头前如何表现自己，如何通过这个案子提高公众形象占去太多的精力，其中担任主控的女检察官在审案中还闹了场离婚诉讼，让年薪是她十分之一的老公为之提供 20%的生活津贴，理由是她在办辛普森的案子，每天要穿不同的西装，一套就要花三千多美元。结案后出版商立即和她签订了五百万美元的出书合同，她摇身一变成了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不再给政府干事。纳税人的九百万美元打了水漂，她却赚了个盆满罐满。这样的人能为社会追求“正义”，真是鬼才相信。顺便说一句，自辛普森案后，加州不再允许摄像机进入法庭对审案过程进行现场直播，大概是为了防止检察官们再犯同样错误，光顾了表演，忘了自己的 **burden** 吧。

还有一个“道德”经典案例。美国犹他州摩门教会较多，一些封闭的摩门教区至今实行一夫多妻制，最多的，一个男人有三十多个老婆。这让基督教徒们恨得咬牙切齿，就是不信教的人也无法容忍这种制度的存在。无奈一夫一妻是基督教的教义，犹他州州法里没有这条，不喜欢也没办法。大概是三年前，犹他州政府检察官终于准备将一位摩门教区里拥有三十多个老婆的男子送上法庭，这个家伙和他的辩护律师还在美国 CNN 很有名的 Larry King 访谈节目里露脸，侃侃而谈这是宗教自由，个人自由，被告是个好丈夫，将自己的妻儿老小照顾得很好。访谈中还插播了被告的儿女和与他们年龄几乎不相上下的小妻子们一起嬉戏的镜头，似乎是一个快活的大家庭，一付“你们不要少见多怪，多管闲事”的样子，看得我直恶心。可是要弄倒这个家伙，对政府来说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最后好像是终于有一个年龄不满十六岁的小妻子同意出庭作证，证明自己并非自愿嫁给这个男人，这样，政府检察官以强奸幼女罪获得法庭立案。结果怎样？也是一时媒体热点过去，不再有报道，我也没把自己列进 CNN 网上跟踪此新闻的名单，无法以下文相告。无论结果如何，此案让我真切地体会到，法官和政府检察官不是一家人，各司其职，公检部门不能跟法官私下捏鼓，看谁不顺眼，就立个案把那人送上法庭。即使明摆着违反道德常理的事，没有相应法律条款参照，法官不同意立案，检察部门说下大天也没用。

写到这里，似乎还有个“道德”案例值得一提。如果说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是美国学

生运动的大本营，旧金山则可以美国同性恋大本营与之齐名。相对于保守的东海岸，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可说是一个百无禁忌，异议突起的地方。同性恋结婚合法化，这个题目在加州吵吵嚷嚷了多少年，十年前我女儿正上大学时，一次与室友辩论这个题目，她的室友说服不了她，气得挥着拳头大喊大叫，甚至用脚踢门，足见这个题目在一些美国人心里扰动程度。它甚至是历届总统候选人所必需面对媒体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回答，回答的巧妙程度，直接对选票造成影响。四年前，旧金山市选出了一位三十出头，身高一米九多的帅哥市长——纽森。上任不久，他先是闹了个离婚、与婚外恋女友结婚，然后搞了个“大手笔”——允许同性恋在旧金山市政府大厅举行婚礼，市政府颁发结婚证书，他本人主持了第一批同性恋结婚者的婚礼仪式，出尽了风头。记得第一对儿登记的新人是两位同居十多年，快八十岁的老年妇女。一时间，同性恋者从全国各地涌进旧金山市府大厅，市政府应接不暇，紧急呼吁要事先预定，不能想来就来。不到一个月，仅颁发同性恋结婚证书就让市府进项七百多万美元。这下惹恼了反对同性恋结婚的团体，游行示威，然后一状告到市法院。市法院接了案子，不久裁定下来：旧金山市府允许同性恋结婚违反州法。得发的证书不算数了，市政府忙着退钱。还没消停，同性恋不干了，也是一通游行示威，一状告到州级法院，州法院立了案，法官们讨论、表决，四对三票，微弱多数，认为同性恋结婚符合美国宪法精神，旧金山政府做法在加州合法。同性恋们乐疯了，这次不单是旧金山市政府，加州凡是颁发异性结婚证书的市政府，都不能拒绝给同性恋者主持结婚仪式。整个加州掀起了同性恋结婚潮，包括那些原来被收回结婚证书的人，再次结婚，好不热闹。那边厢反对者则气坏了，紧急行动，集结提案签名，我也接到他们群发的“不允许同性恋结婚”提案，还签了个名。该提案很快达到法定签名人数，被正式列为两年表决一次的加州备投提案。到期投票，法案以微弱多数通过，同性恋婚姻在加州非法了。同性恋哪能善罢甘休，发起反提案签名运动；反对方立即以“永久性禁止再将同性恋结婚提为州备投法案”与之对应，理由是此一争论反复多次，耗去纳税人大量金钱，实应告一段落，画上句号。在这场争战中，反对方认为同性恋结婚不道德，如此下去，人人都有无限的自

由，父女、兄妹、母子、姊弟是否也应给予结婚的自由呢？那不乱了套？赞同方呢，打出的是人人生而平等，美国宪法规定了同性恋与异性恋有同等的生活方式的选择自由。同性恋结婚的支持者们百折不挠，准备积蓄力量，三年后——2012年再见高低。加州的热战在全美国掀起了同性恋争取结婚权力，反对者群起应战的大浪潮，2015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在全国范围内同性恋婚姻合法，一锤定音。这个自1970年代开始的拉锯战总算尘埃落定。

这是一个李慎之先生反复强调的“法治”（rule of law）与“法制”（rule by law）不可混为一谈的典型例子。我过去也常常分不清“治”与“制”的不同，通过这个同性恋结婚合法、非法、再合法、再非法，再争取合法化的反复过程，我才似乎搞明白了一些，美国政府靠法律维持社会秩序，不是用法律治理国家，这个国家的治理靠的是那部两百多年前书写的宪法（constitution），这部宪法以不变应万变靠的是历届立法机构——联邦政府众参两院通过的法律条款（bill）和逐渐补充的宪法修正案（amendments），以及各联邦州州议院历年根据选民、政府部门和议员提案自立的州法（proposition），这些法案的通过和推翻都以是否符合宪法精神被议员们争来争去，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得到确立或废弃。经年积累，法律条款多如牛毛，即使最好的律师也无法全部记住，所以美国的律师没有通才。搞移民案的律师也许能兼着做些离婚案，可决办不了经济案、遗产案；为刑事案辩护的律师，做不了车祸赔偿案；人权律师弄不了商业侵权案；熟悉联邦法的人，不一定能办加州的案……。全世界从业律师人数最多的国家，大概就是美国了，美国人对律师是即爱又恨，爱他们能替自己办案，恨他们给自己捣乱，但这不是本文要说的了。

为了更好地说明美国法律只行维持秩序之责，不担治理国家之任的“与时俱进”的“万变”特性，可再举几个例子。前些日子在收音机里听到，加州有项法律条款，规定高速公路时速不能超过五十英里，根据此法案，州交通部门现在在高速公路上立的那些六十英里、六十五英里、七十英里的时速标牌都属违法。这个法案显然早就过时，被人忘在脑后，不知被哪位法律学生翻出来。州议员们赶紧开会，废了这个条款。再比如，2009年7月23

日加州议会通过法案，正式向居住在加州的中国早期移民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道歉，我才知道 1957 年之前，加州法律是不允许华人拥有房产的。该条款在六十年代废除，四十年后加州政府正式为这一法律的不公正性道歉。联邦政府的法案也不例外。“911”后不久，小布什总统在国会通过了“爱国法案”，该法案条款允许警察随意监听老百姓的电话和检查电子邮件、信件等私人信息。结果发生了伯克利大学有两个学生在电话里交流如何玩一种带炸弹的电子游戏机，被警察破门而入这样的事情。此案的有效期为十年，小布什任期届满之前曾想在国会将该法案永久化，但是这个时候美国老百姓已经从“911”的爱国狂热中清醒过来，发现事情不大对头了，政府和总统在爱国和反恐的招牌下太恣意妄为，老百姓丧失了许多受到宪法保护的权益，布什领导的政府的权力越作越大，长此下去是太可怕了。国会议员们在选民一片反对的压力下，否决了该法案的永久化。奥巴马上台后，将这个法案又延长了四年，但是对公民电话的普遍监听变为由电话公司保留通话记录，如需索取监视目标的通话记录，必须获得联邦法庭的批准。

美国的西洋景看多了，慢慢便看清了：正义和道德是美好的词句，充满正义和道德的社会是诱人的境界，无奈真实的世界太复杂，人们的认同太相异，什么是真正的正义，什么是真正的道德，谁能说得清楚？连一个妇女堕胎的小问题，在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争论了多少年，说清楚了哪个做法道德、哪个做法不道德？是共和党在为妇女主持正义，还是民主党在为妇女主持正义？小布什宣布向伊拉克开战时用了“十字军东征”的比喻，后来看结果不妙，赶紧改口，其实那是他这个极端的基督教徒的真实想法，伊斯兰教在他心里就是邪教，基督教就是要灭了那些家伙。所以人们必须走出追求正义和道德的误区，只为程序公正而争。只要有了程序的公正，无论在农业小国，还是工业大国，都不会有“帝国制度”存在的基础，换句话说：“帝国制度”在公正的程序下不堪一击。■

【随笔】

独酌翁杂忆

梁沪生

亲睹李劫夫

李劫夫何许人也？

当下的年轻人应该无人知晓。年龄大若我辈者，也未必还记得这个名字。但若告之，几十年前流行的那些或雄壮豪迈，或委婉深情的红色歌曲，比如说《我们走在大路上》，比如说《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等等，都是出自这位作曲家之手，便会顿时恍然。特别是文革时期响彻中华大地唱遍大江南北的毛主席诗词歌语录歌，更使这位红色音乐家红透了半边天。若论粉丝之众，今天的周杰伦辈，岂能望其项背？

如今我常当面调侃我现在的学生们的追星举动，回想一下，当年我们也是这般年纪的所谓文青，不也对李劫夫这样的艺术名流抱着无限景仰崇拜的心态吗？听说李劫夫要到我们工厂来，数日前就开始兴奋不已了。

记得那是1968年的初夏伊始，厂里便传近日将有贵宾造访。我在另外的文章中已提到过，当年我所在的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名声赫赫，不仅有过两次引发全市大武斗的辉煌记录，而且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都走在前头，深得省里重视，于是国内外的嘉宾的参观访问即为常事。国外的有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尼泊尔比南德拉（应该是这个名字吧？）国王，甚至还来过一个罗马尼亚军队的歌舞团。

那日，一辆大客车驶来停在工厂大门口，厂军管会数名军代表匆匆迎上前去。从车上下来的也是数名军人。那时候的军装只有“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看不出军衔军阶。迎接的军人立正敬礼，下车的军人笑容可掬地还礼，在前者引导下沿厂区大道走来。

是李劫夫来了。同行的还有另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叫傅庚辰。另外的军人是他们的随行人员。

厂区大道的夹道欢迎极具时代特色和纺织行业特色。年轻的纺织姑娘们身着白围裙头戴白帽挥动鲜花跳着忠字舞，热情地对贵宾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这些年轻的纺织姑娘，现在在广场舞大妈的队伍中还能看到许多人曼妙的舞姿）

欢迎会场就设在办公大楼前的小广场上。我当时是厂广播站的广播员兼记者，安排欢迎会的扩音器材和录音设备是我的任务。守在这些器材旁，使我得以近距离亲眼目睹两位当红音乐家的风采。

李劫夫年龄略大稍胖，傅庚辰挺帅堪称英俊。两位都显得神采奕奕红光满面，合体的军装在身，使他们既有艺术家的气质又显军人的威武。

据称，他们是受江青同志的委托，到刚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四川来看望四川工人阶级的。主客双方礼节性的套话结束，大家当然想亲眼目睹艺术家的才华。

提起傅庚辰的名字，同样知晓者甚寡。可你说起电影《地道战》，那年头哪个人没看过十遍八遍的？老村长为保护乡亲们牺牲于日本鬼子抢下，主人公（高传宝？）夜不能寐，秉灯夜读《论持久战》直到天明，直到“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思想放光芒……”于是茅塞顿开，有了“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千万……”的传奇。

作曲家傅庚辰不负众望，亲口唱了首“太阳出来照四方”，刚唱两句，独唱变成了千人大合唱，唱毕博得掌声雷动。

该主角表演了。唱什么？有人喊“我们走在大路上！”；有人吼：“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还有人喊：“造反有理！”（根据毛语录谱曲，歌词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斗争，就反抗，就干社会主义！）

大家不愧为大家。只见李劫夫带着自信的微笑，沉吟片刻，挥挥手朗朗而言：“同志们同志们，这样吧，这次我和庚辰同志也是为庆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而来，我认真学习了

人民日报为此而发表的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社论里传达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四川很有希望’，现在就让我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把这句最高指示谱成曲，让大家都来传唱好不好！”

“好！”

李劫夫又挥挥手请大家安静，再次沉吟了片刻，拿起话筒唱了起来：“四川很有希望，四川很有希望，四川很有希望，四川很有希望！”

一句话唱了四遍，先是低沉稳重，继而转为洪亮，最后一句变得高昂！再次博得掌声雷动！

我从旁观察。红色作曲家在这一瞬间，以我当时一个小小崇拜者的脑海里，蹦出的词句是神采飞扬！踌躇满志！舍我其谁！

该回到我在篇首提到的那篇网文了，挺标题党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作者下场有多惨？》

关于李劫夫，文中这样介绍：李劫夫是中国近现代著名作曲家，曾创作了大量的毛泽东诗词歌曲和语录歌曲，最为著名的就是曾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文革期间，他与妻子被关入“学习班”进行审查五年多，直到四人帮被打倒，还没有散班的消息。1976年12月17日因心脏病发作，死于学习班中。

据说，写了一首《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是他受审查而始终未被解脱的重要原因。下场是挺惨的。我见到的李劫夫，应该是他人生最踌躇满志飞黄腾达的时候吧？

人啊人！■

感受山雨欲来

朋友圈里有不少“生快”的致意，不是给我的，是我的学生们相互的祝福。他（她）们都是刚满20岁的90后。刚过去的这个暑假，作为大学生，结伴日本、泰国旅游的，

杭州、上海艺术实习的，真是丰富多彩，浪漫幸福。这不，还有一帮，刚从乌镇戏剧节以自创自演的节目演出归来，收获满满，幸福盈盈。

20岁，无比美妙的年纪！不由回顾检索，20岁那年，我在经历什么？

穿越时空，是50年前，公元1966年。那一年中国发生了什么，世界人民都知道。那一年咱们还是还未出师的学徒工，懵懵懂懂，只是从广播里听到报纸上看到，在批判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燕山夜话》，这是北京的中央的级别，到了省里，则是批判马识途张黎群李亚群。说是要搞文革。尽管厂里的广播一早一晚也照本宣科说着这些事儿，工厂里的人们还是觉得与己无关，无非再来一次反右斗争，那也是文化界文艺界的事儿，咱们照样在车间里三班倒。

然而就在夏秋之际，也不知从哪天开始，工厂里的人们也感觉到气氛突然紧张。厂里从干部到基层，由党员至团员，紧急传达了一项严厉的禁令：

学生造反，已从学校闹到社会。为此，员工一律不许外出上街，不许看热闹，不许看大字报，不许传播谣言。若干个不许不许，违犯者将受到严厉的组织处分。

严令之下，龟缩了几日，终于按捺不住，周日早晨夜班一下，借口回家乘车离厂。厂在东郊，家在西郊。8路公交车可直抵市中心的春熙路，然后转车回家。车到猛追湾游泳池，突然改变主意，下车徒步而行。听说前面的西南局很热闹，想一看究竟。

心中一直抱怨这些当官的“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岂知天下还真有事——西南局门前果然热闹，热闹得吓人。大门内外糊满了大字报。一帮大学生模样的人，男女都有，正在在门口刷标语。其中还有几个中学生模样的小孩儿，提着糨糊桶在替大学生们打下手。标语内容触目惊心：

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

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

西南局省市委和李井泉都被打了大叉叉。

西南局省市委是什么？本地最高领导机关。李井泉何许人？西南地区最高首长威名显赫的李政委。解放大西南？大西南不是在49年50年就被我解放军解放了吗？

说实话，当时看了那标语，有点胆颤心惊。

围观者甚众，议论纷纷。胆小者窃窃私语：“这不是反动口号吗？”胆大者义愤填膺上前质问：“你们这些娃娃，肚子吃饱了抽的？要造反要变天吗？”

“我们就是要造反！造西南土皇帝的反！”刷标语的大学生中一人挺身而出。

哟，好熟悉的身影，好熟悉的声音！吴磊！我的初中同学，听说去年考上了成都工学院。只见他摆出舌战群儒的架势，历数西南局省市委对抗中央指示反对伟大领袖的罪状，硬把一出辩论变成了个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说。记得这小子当年在班上沉默寡言说话木讷，几年不见，怎么就变得如此伶牙利齿，还充满激情？

周末上街看热闹的显然不止我一个人。周一的车间里可以看见到处都有聚在一起议论纷纷的人堆，显然是在流传着大街上的所见所闻。有的人甚至吹得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对此厂领导大为恼火，展开清查。自有积极分子把名字报了上去。那些上街去看了热闹，回来又管不住自己嘴巴的人，都被叫到车间办公室去被勒令写检查写保证。

工厂的气氛日益紧张。没几日，“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标语开始出现在工厂的生活区。这无疑给本来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有关厂领导更是如临大敌。除了紧急派人撕去标语外，又由各车间抽派积极分子在进入工厂生活区的入口处严加防查大学生模样的嫌疑分子。

然而事态的发展证明这一切都是徒劳枉然。发生过几次小摩擦之后，厂方终于没能挡住大学生们要将学生运动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决心，人家这可是执行最高指示的革命行动。据说针对各地“一小撮走资派”组织工农围攻学生的情况，伟大领袖发了

指示，人民日报发了社论，要求各级官方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

生活区食堂外是个篮球场。为了表示对文/化/大/革/命拥护，厂里在这儿修了些贴大字报的专栏。也成了大辩论的场所。大学生也进来了，作为他们宣传的阵地。四川大学、成都工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四川医学院……都建立了驻厂革命造反联络站。在成都工学院联络站的学生里，我又看见我那位初中同窗吴磊的身影。

大学生们胳膊上都戴着各自红/卫/兵组织的袖标，个个都意气风发。宣传、演讲、辩论……由官方渠道传达下来的观点和要求，显然与中央报刊传达的最高指示明显矛盾明显不符。他们对工厂的封闭对消息的封锁也引起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工人们的逆反和不满。对学生们的态度，从开始的质疑、围攻，转而同情、支持。激进者开始与学生频频接触谋划，不少单身宿舍里孕育着爆发的火种，孕育着即刻到来的揭竿而起。

这是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

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每个人都意识将面临从未经历过的风雨。期待？兴奋？忐忑不安？战战兢兢？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自有不同的感受。

但是没人会意识到，每个人的灵魂都将在这场狂暴的山雨中受到人性的拷问。■

【述 往】

一个地主崽的一生（二）

——“四类分子”·市管会主任·贫协主席

韦文德

当天下午就在圩上梁姨妈家，用六张条凳、三副床板铺成了三张床，用三块泥砖在门

背围成一台炉灶，架上锅，生火煮好在这里的第一顿饭，就算在三都圩上把这新的家安顿下来了。

三都圩在后河与纳湾河相伴而流的中间，在两条河水满河床，奔流成势之时，就像是两条奔腾的蛟龙，翻滚着向鹤山汇流而去。三都圩恰像是两条蛟龙戏耍之中的一颗硕大的明珠。据老人们说，三都圩是一个做生意的风水宝地。所以这圩上的有钱人多。

财富从何而来

三都街是生意人聚居的地方。相传这里还是个老虎地，每圩百十头猪肉上市都可以卖得完。那么多的土特产品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到散圩时也不见有往回挑的。人们说，如果这里有一条大河流过，水路交通方便，这里的繁华绝不亚于柳州。这话有道理，古时是以水路交通为主的。似这般景况，这三都街上谈不上商贾汇聚，却也是小商小贩云集之所在。就拿这街上的居民来说，多半是生意人，都善于经商，成天和钱打交道的，自然就不乏有钱人了。柳州一带自古以来流传有一句顺口溜：“一都米、二都女、三都大财主。”这话并非谰语，都是有根有据的。土改时划成分，这街上的住户，四家中就有一家地主或工商业兼地主。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四类分子都必须在自家的门头上钉着一块写明家庭成分的牌子，从高头圩往底下圩数，隔着一两家就有门头钉着牌子的，有时还连续两三家都是，当然其中还包括有其他四类分子在内。

这街上众多的富人（相对于本街的穷人），之所以能聚敛起足够把他们划成地主的土地、财富，在那弱肉强食，人人都想发财的年代里，除了他们具有精明的经营之道外，也和他们都具有勤劳耐苦的精神分不开的。

这街上的工商业兼地主中，有手艺人，有杂货零售商，有行医卖药的，而当时最为有钱的，还数那几家开米粉店的。而他们的辛勤刻苦是人所共知的。从每天夜里的凌晨一点钟起床，就开始淘米、磨米、生火、烧水，要在天亮前把米粉蒸好，还要赶早到肉市买回

筒骨熬汤，买回粉肠瘦肉，切好烫好，天一亮就一边摆摊开市，一边切粉、烫粉待客，忙得不停不歇。到八、九点钟时，作为家庭主妇的“地主婆”，还要腾出时间，用洗磨洗桶洗锅的水煮猪潲喂猪。每家至少喂四五头猪，一年总要出个两三栏。养猪可不是轻松活，光端潲水就会累得你直不起腰来。实际上卖粉这一行业的利润大部分来自于养猪的收入。

通过这种形式，他们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在发家致富、出人头地的思想动机下，拼命的、省吃俭用地倾其所能，不失时机的购置田地、房产。他们家庭人口多的，基本就是自己劳作。人口少的，就不得不雇工。雇用的帮工也多是自家的亲戚、近邻，没有这层关系的，还找不到这份工作。产业大了，要顾生意就没有余力顾及田地农活，那就只有雇长工打理或把田地租给别人种。在农活季节上忙不过来，还要雇短工，这其中就形成了剥削关系，土改时也就成了被斗争的对象。

“四类分子”韦然

三都自古以来三天一圩。每逢圩日，从上午八点钟起，在每一家门前的骑楼下就摆着凳子、摊板占着摊位。而在这之前，天还没亮，那些卖柴的、卖菜的，卖肉的就已经陆陆续续地，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圩亭子下面，熙熙攘攘的开市了。所有的粉摊的汤锅都冒出腾腾的热气，满街飘散着烧鸡烧鸭和叉烧的香味。特别是韦然的狗肉摊，更是飘逸着让人睡着觉都能闻到那股浓浓的生焖狗肉的，令人馋涎欲滴的香味。

想到韦然的三都狗肉，还真是柳州一带，方圆百十里地内出了名的人间美味。三都人也因此而养成爱吃狗肉的习惯。但凡朋友聚会或什么工程开工、竣工的，特别是后来每年秋收过后的大修水利运动，被生产队派去修水库时，大家就用生产队发的伙食补助，在开工前，去买只狗来杀，名为庆祝开工，实为大饱口福。不管怎样，那味道就是和韦然亲手弄的差那么一大截。毕竟那是人家世代家传的手艺。

三都人爱吃狗肉，对韦然这个人也就有了特别的亲近感。韦然的狗肉好吃，韦然的故

事也成了三都街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对三都街的记忆中，就少不了韦然的轶闻趣事。

韦然家在大河街，他在三都一带算是个知名人物。一是因为他的生焖狗肉绝技远近闻名。更因为他为人豪爽、耿直、刚烈、幽默，尤其是他的直言不忌和敢作敢当的直率和无畏，大人小孩都喜欢他，甚至于把他的话当成座右铭、口头禅。“人头换芋头”这句话，就是从他的口中讲出来的。他这句话里透出的是一股弱者面对权势的反抗精神。这句话流传至今，成为三都街人顽强不屈的精神口号。

按土改时划的成分，韦然的家庭成分是小贩，小贩即相当于贫农。但由于他的心直口快，不知什么时候起，政府就给他戴了个“四类分子”的帽子。帽子他心安理得的戴着，从来不喊冤枉。政府开的“四类分子”会议他从不缺席，民兵派的义务工他照做，想说的话他还是照说，想做的事他还照做，还真有点死猪不怕滚水烫、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

他吼出“人头换芋头”的故事，是发生在三年饥荒过后的1962年秋天。之前三都圩的这些繁荣景象，在我的印象中已经消失殆尽，三都圩作为圩场的功能，已经被取消了几年之后，刚有限的恢复了自由市场，由有史以来的三天一圩，改成了一个星期一圩，有市场管理委员会严格监管。入市交易的商品，主要是人们为了度荒而拆房得来的旧瓦，旧桁条椽子，拿来圩场卖，以期换些土产杂粮回去度荒。那些土产杂粮是由于政府允许有限的开荒，从那些偏远的，有荒可开的山里垌场，开荒种的红薯、芋头、木薯等土产作物。但凡工业品只有供销社经营，且没有多少商品可卖，柜台里也只有些稀稀拉拉凭票供应的布匹、肥皂之类的东西而已。食品类也只有食品站凭票供应的猪肉，而且也是时有时无的。那些在柜台前排队的，大多是非农业的居民，农民就是有票也没有钱买。农民就是自己养有猪、鸡、鹅、鸭、兔都必须由食品站收购，个人是没有权利屠宰卖肉的，但对于狗却没有规定。

韦然是非农业居民，没有什么职业，因为他是四类分子，合作粉店又不要他。那时合作粉店在街上也是仅存一两家，是国家定量给他们的大米指标，一天的粉也卖不了几个小时就卖完收摊了。所以粉店的职工也是由上级定的，用不了几个人。韦然也就不得不操起他的老本行卖狗肉。卖狗肉市管会也是不准的，没有办法，他那二十四斤米的口粮指标，

也还要有钱才买得起呀！饭总是要吃呀！生活逼得他不得不硬着头皮，拿起他弃之多年的打狗棒，重操旧业，走村窜巷的买来一只狗，一大早起来拾掇干净，到十点多钟时，就挑着焖好的狗肉、砧板、案桌，到三角地黄继周家门口的街边摆起个狗肉摊子。冷落萧条的圩日又开始飘散着阔别已久的狗肉香味，招来不少面带饥色的食客。六分钱一两熟狗肉，人们三分钱六分钱，半两一两的，就着那张小方桌、小矮凳，外带一杯半杯私酿的木薯酒。生意倒还可以，但却招来了市管会的人，说这是投机倒把，要韦然收了摊子，到市管会去接受处理。此时，那些吃客怕事的，就急急忙忙三口两口吃完就走。那不怕事的，就坐在那里边吃边看热闹。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把个狗肉摊子围成个人圈，说什么话的都有。大多都是私下里议论着，都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又不敢明着站出来跟市管会的理论。韦然一直都采取不理睬的态度，照样的拿着那把切肉的刀，该切肉的切肉，该舀汤就舀汤的招揽着客人，也不抬眼望一下那个市管会的人。那市管会的人见他居然敢对自己置之不理，便拿出了国家干部的威风，吼道：“你这个四类分子不服从管制，把你捆起来，送公安局去关起来。”边吼着边冲过去要捡韦然的摊子。人们摒着气看着，只见韦然虎着脸，不声不气地抬起拿刀的手，狠狠的就劈在砧板上，暴出一声怒吼：“来吧！人头换芋头。”这一下把围观的人弄得目瞪口呆，那市管会的人被这一下歇斯底里的怒吼也吓得瞠目结舌，束手无策的下不了台，只得灰溜溜的低着头，从人缝中挤出去，铁青着面孔，不声不气地回市管会去了。在他背后的人群中暴响起哄堂的喝彩声。人们为韦然的勇气喝彩，也为自己终于得出了一口憋屈已久的恶气喝彩。自此，这“人头换芋头”便流传开来，成了三都街人不畏权势的精神口号。

关于韦然的轶闻趣事，在三都街流传得很广泛且持久。几乎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直至现在，人们在闲谈中提到韦然的时候，还都争着讲述自己所知道的韦然的故事。

像韦然那样的人，在那阶级斗争的年代里，被作为阶级斗争的典型批斗是经常的事情。他自己觉得已是司空见惯的不当回事儿了。而街坊邻居们也都把对韦然的批斗会当作是一场文艺晚会来欣赏。直到现在，人们还经常津津乐道的描述着韦然的笑话故事。大家都记

得，在一次韦然的批斗会上，有人揭发韦然曾经说过希望蒋介石回来的话。人们知道这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大家都猜测韦然不会承认的。但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想不到韦然却很坦然的当众承认了。当那些干部们质问他为什么希望蒋介石回来，是不是要等蒋介石回来了好向贫下中农反攻倒算搞报复？并喝斥他老实坦白交待。韦然不慌不忙的，脸不变色心不跳，正儿八经地答道：“你们现在总是拿我来斗来斗去的，我总是只有挨斗的份，我希望蒋介石回来了，我也就可以批斗他一下。”他的话一出口，会场上立即曝起一阵笑声。搞红海洋那阵子，街上沿街骑楼走廊的柱子上都给红油漆刷成了红色，并全都刷着标语口号。那天韦然也在人群中看工作队的人在用黄油漆描着“毛主席万岁”的标语，他又是本性不改地忍不住对一旁的人说：“毛主席万岁错了”。工作队的人一听这话，扭过头一看是韦然在说，马上把手中的笔和油漆放下来，伸手抓住把他的臂膀质问他：“你这个四类分子，竟敢当众讲‘毛主席万岁错了’？”，他奋力甩开那人的手说：“毛主席万岁就是错了嘛！应该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那人被他弄得啼笑皆非又无可奈何。在场的人又是禁不住的在一旁窃笑。在一次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大会上，韦然这一次是被抓来陪斗的，见那个经常在会上反反复复不知道诉了多少遍苦的人又照本宣科的发完言后，他也以一脸委屈的模样，苦着脸诉起苦来，他说他命最苦，才八个月大就给地主打工，受着地主残酷的剥削。主持会议的干部斥责他蓄意捣乱。他辩解称：“我是挨地主剥削呀，为什么又不准我诉苦呢？”那会议主持人似乎很实事求是的说：“你这不是故意捣乱是什么？你才八个月大就会打工？”他接口答道：“我在我娘的肚子里头才八个月大，我娘就去给地主打工，我不就是挨地主剥削吗？”他的“狡辩”引起会场上的又一次哄堂大笑。这些韦然的故事，尽管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让我们听起来还是觉得开心过瘾。

市管会老梁

说起那被韦然以“人头换芋头”吓着的市管会的人姓梁，年纪在三十岁左右。当时三

都市管会也就他一个人。他的权力可大着呢。赶圩的，摆摊做买卖的，都得看他的脸色。卖柴火的，卖菜的，卖猫的，卖狗的，卖蛇、卖蚂拐的，只要他说你是投机倒把，轻的没收罚款。敢于和他论理的，就是不服从管理，把你绑起，挂个投机倒把的牌子游街示众。

据说市管会老梁是里雍公社的人，由于他的权势、地位，在三都街讨得了一个算是百里挑一的漂亮老婆，但他在三都人眼中并不受人喜爱，那些受过他处理的、没收过东西的人，对他恨之入骨的人还不少。在这些人当中，也还有些和韦然一样，敢于“人头换芋头”的人，在那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给来点硬的招式。我就亲眼目睹过这么一个场面：在一个圩日的下午，有个从村上来的老农，用个鸡笼子装着两只兔子在街边摆卖，被他连兔带人的抓到市管会去，那人辩说是他自家养的，怎么是投机倒把呢？他硬说人家是贩来的，就把兔子没收了，叫人家回去大队开证明来。迫于他的淫威，那人只好悻悻地回家去，过到下一个圩日，那人还真的开得了证明，来到市管会找他要兔子，他却说，那么多天了，哪个有空帮你养兔子，已经交给食品站去了。那人听得是眼冒金星，二话不说，抡起手中的扁担，照着他的头就劈了下去，好在那扁担长，被楼板挡了一下，减缓了力道，只把他的头劈得血流满面，却幸好保住了他的一条命。那个老农后来给公社的公安抓走了，据说被判了两年劳改。

那个老农在新兴农场劳改的两年里，市管会的老梁，不知什么时候也从三都街消失了，传说是带着他老婆孩子，调回他老家里雍市管会去了。再后来，他老婆又带着他两岁的女儿回到三都街娘家。听人们在他老婆背后议论说，他因为贪污，也被判了十几年劳改。在他劳改的那段时间里的阶级斗争红色恐怖年代，他老婆却仍然是三都街上大队领导眼中的红人。但他却熬不到刑满，就在劳改农场里病死了。他老婆孤女寡母的，也就没有颜面再在三都街上住下去了，带着女儿就回了他的老家去。过后，人们在议论到当年的自由市场和市管会时，不免都提到他，都不免感叹天道轮回，恶有恶报，善有善报。那都是后话了。

贫协主席老华洋

长塘村的贫协主席老华洋，在韦然的狗肉摊边喝酒吃狗肉时，讲了这样一个笑话故事：说是他们村有一个在土改时被划为地主的人家。那个老当家的，是个出了名的节俭和死要面子的人。他不光是对他家的长工吝啬，对他自己家的人也一样小气。他家除了过年过节有些酒肉外，平日里是绝难尝到荤腥味的。但是他又时时在村人们面前吹嘘，他家天天晚上都有肉吃。他吹得多了，人们也就信以为真。但是从来没有人看见他上街买肉，都以为是他家里长年存有腊肉。

终于有一天傍晚，人们看到他气急败坏的操着扁担，骂骂咧咧的追打他家的老猫，从他口中嘟囔的“他妈个B这个死猫，连我抹嘴巴的肉你都拖走，我不打死你”的话语中，和其后他的家人，因不满其吝啬而透露出来其中的奥秘才知道：原来，他为了显示他家庭生活的滋润和富足，不致于让人们把他看成是守财奴，就在他家灶台上长期吊着一块不足二两的肥猪肉，每天晚饭后，他就用这块肉把自己的嘴巴抹得油光发亮后，膈肢窝夹着一杆长烟斗，提着一张小板凳，响响的打着饱嗝，志得意满的到村中间的大榕树下，翘二郎腿，抹一下嘴巴，把整个脸都抹得泛着油光。然后用草梗剔着他那发黄的牙齿，口中嘟囔着：“这牙老啦，吃点肉都卡牙。”接着就眯起眼睛，吧哒吧哒的抽着他的叶子烟，向天仰着头，喷出浓浓的烟雾。

老华洋讲完故事，在场的人都笑起来，他自己也笑得嘴里的酒都喷出来了。他又喝了一小口酒，夹了一丁肉放到嘴里嚼着，然后眨巴着嘴巴得意地说：“要那么多田地做什么？到头还不是给土改完了。还不如我，天天有酒有肉有饭吃饱，比什么都舒服。”这个故事不管是真是假，人们都相信，那些农村里的地主们的田地，都是从他们的牙缝里省下来的。当然在这些富人当中，也包括在穷人们当中，不乏奸狡利猾之徒，为了攫取财富，而不惜损人利己，甚至于做出图财害命，伤天害理的事来，这是所有的人，包括富人、穷人都不会见容的。

老华洋（这是他的外号，没有人知道他有没有正式的名字，也许压根就没有人给他起过名字。）身材高大魁梧，为人豪爽、义气，因为自小父母双亡，又家徒四壁，无田无地，虽勤劳，但就是嗜酒如命，所以终身未娶，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鳏夫一个。平日里靠给人帮工赚些口粮外，专以卖柴为生，过去三天一圩，一圩一担柴火。每圩日早上九点来钟，这街上的人们准能听到他“让开！让开！猫抓刺喔”的吆喝声从高头圩响到底下圩。人们只要听到他的吆喝声，远远地就主动的给他让路，夹道欢迎似站在街两边，目送他挑着一大担整齐的高山柴，汗水淋漓地，迈着沉稳的步伐向底下白坟的柴行奔去。

卖完柴得了钱，就到粉摊边一碗米粉一碗酒的吃起来喝起来。他特别爱到韦然的狗肉摊，要一碗狗肉粉，一碗酒，边喝边聊。和酒友聊，和韦然聊，摆古论今。他虽没有文化，但他的记性特别好，声音宏亮，口才也不错，一两酒下肚，常常能侃侃而谈上个半天，再加上和韦然趣味相投，韦然有空时又添上一勺半勺汤肉，倒上一两二两米酒，也不嫌他误了自己的生意，就陪他边喝边聊，有时能聊到散圩收摊为止，才瘾足肚饱的踉跄着步子，到圩亭下的肉行去，再买它一斤半斤卖剩的便宜的猪肉，再用他随身带着的光身的军用水壶，到杂货店里灌上一斤酒，挂在扁担头，扛着扁担，满面红光的微笑着，心满意足、步履蹒跚地回家去，一路上逢人就爽朗的打声招呼，他虽嗜酒，但他饮食有度，从不见他犯过糊涂，发过酒疯。

土改那年，他已是快五十的人了，工作队见他鳏寡孤独一人，家里穷得是标准的贫农，就动员他当村里的贫协主席，他不想干，工作队说，打倒地主以后要分田分地的，他就当了，不过他这人做事公平，讲良心，不冤枉人，不害人，在斗地主时，有一些人总想趁机泄一下私愤，动辄拳打脚踢，欲置人死地而后快，他总是拉着拦着。他说：“都是本村同祖同宗的兄弟，过去有什么过节恩怨，现在他的财产也分了，田地也分了，也算是他的报应了，何必要伤他性命，搞得过余了，以后还要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自己给自己留条路走，恶有恶报，善也会有善报的。”人们都认为他的话实在。

工作队也认为他对党的政策掌握得好，后来就推选他为贫协模范代表，坐公家的车去

省府南宁开会。开会回来后，乡里召开群众大会，工作队让他上台讲话，他事先也喝了一点酒，红润的脸庞，满脸笑容的走到台前，清了清嗓门，用地道的本地壮话，朗声说道：“我这次搭傍老毛，得坐公家的车去南宁开会，去南宁玩。南宁那里房子又高又大，街宽宽的，平平的，我们村也象那样就好了。这次去开会，吃饭不要钱，管吃饱，餐餐有肉，就是没有酒，”听到这里，人们都笑起来，工作队的就提醒他，要讲点开会的情况和感想，于是他歇了一下，继续说道：“这次去南宁开会的人很多，会场里人千人万，有男有女，我远看近看，左看右看，一个人一个脸貌，一个不同一个。”人们哄堂大笑起来，工作队的人感到不满意，只好叫他停下来。其实他所讲的这段话并没有什么错误，而且很有内涵，只不过他不会用政治宣传的方式来表达而已。从他的话里可以理解为：“翻身解放了的人民，生活美满、幸福，各族人民心中感激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并立誓团结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决心捍卫我们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老华洋分得了田地，他也还是坚持打柴卖，他的生活没有改变，不过他不用给别人帮工换粮食了，他伺弄着自己的田地，收获着自己的劳动成果，以他的老本行换来酒钱肉钱，他觉得他的生活已经足够自在，足够惬意的了。但是这样惬意的生活却在不久的几年后，完全破灭了。人民公社化，把给他的田地又收走了，公共食堂虽然吃饭不要钱，但吃不饱。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把山上的柴火都连根拔光了，就是有柴火也没有地方卖了，他失去了他原来的自由。又过了没有多久，连公共食堂也没有饭吃了，人们都浮肿的浮肿，有的因吃野果野菜中毒而死的，有被老糠塞堵肛门，憋闷而死的。那些死的人有和他同龄的，也有比他老的，比他年轻的，他在浮肿和饥饿难挨的时候，曾感慨的对人说，以前我没有田地，帮过地主打工，卖我的柴火，我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挨饿过。

他终于没有熬过三年的饥荒。■

【文摘】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何方

一 2007年在一个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来讲两个问题。一个，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一个，什么是社会主义？

虽然我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至今仍然不十分清楚，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反思，也可以做出以下几点判断，向方家请教和参加讨论。不过这里着重谈科学社会主义这一中心课题，而不多涉及哲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其他方面。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掀起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人类有史以来，就追求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其含义虽然各地区和各人群并不一致，但是许多因素还是大同小异的，如自由、平等、公正、正义、民主、均富等。这些自古以来就有的理想，先后形成各种学说和信仰，不管叫什么名目，是大同世界还是乌托邦，但都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

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到19世纪初，具有社会主义理念的不同派别就先后兴起，在欧洲形成了日益广泛的运动。不过开始阶段，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不但派别纷杂，而且思想混乱，什么货色都有，不光是都属于空想社会主义，还多为一些不同的封建贵族、宗教派别和资产阶级所利用。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不算长的时间里，战胜社会主义运动中其他流派，处于优势和领先地位，首先因为它是在当时欧洲几门先进学说的基础上，空前地集中、提高和发展了历来社会主义运动的要求和理念（就是解放全人类，求得人的自由、平等、博爱、均富），建立起了一整套站在时代高峰的理论体系。也由于这一理论是一门科学，目的在于拯救无产阶级和其他劳苦大众，因此自然会得到他们以及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欢迎拥护，成为这些人的信仰。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的学说特别强调理论和实际的联系。他和恩格斯直接参加和指导国际工人运动，并执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不断修正和发展自己的学

说，使之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接近真理。所以不论人们怎样评论，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谁也不能否认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这就是为什么不但工农群众，而且连西方学界也一直敬重马克思，一再自觉自愿地推举他为“千年第一学人”的原因。

第二，马克思主义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正像其他科学一样，是在探索真理，并没有穷尽真理。所以不能说它是“科学的科学”、“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既是科学，就不但能被证实，也能被证伪。证实的当然应该坚持，证伪的就必须加以修正和扬弃。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必然受到那个时代的限制，一些观点以至基本原理的错误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本人就在对他的学说进行着不断的修正，后来恩格斯独自领导工人运动的12年中更有重大的修正和发展。无怪乎一些人说他们的学说存在着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有些人只记得《共产党宣言》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强调两个“彻底的决裂”。其实马克思老早句认为在一些民主国家如英、美以及荷兰，可以实行和平转变，经过普选，工人阶级就能取得政治统治。到了1874年，恩格斯更进一步认为，“暴力革命在许多年内是不可能的了”，“只剩下开展合法运动的道路”。十年后，他更直截了当地说，“历史表明我们曾经错了”，1848年时提出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陈旧了。”

面对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和自我调节，他还承认，“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可以通过普选和代议制等民主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原话是：“旧社会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他也不再坚持砸碎中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主张继承其立宪和共和制度。恩格斯不只在理论上修正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同他的朋友和学生如伯恩斯坦、考茨基、倍倍儿、李卜克内西、普列汉诺夫等，创建欧美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在实际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运动引向高潮。

第三，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和理论体系。而列宁主义只是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一个“左”的流派，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旨在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些根本性的修正，历史证明这些修正是错误的。中国一直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是列宁斯大林主义。中国革命遭受挫折和走了弯路，特别是共和国成立后头28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这是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有空想的成分和“左”的倾向，而列宁主义走得更远，使它和马克思主义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脱节。上面我们就列举两者之间一些主要的区别，只是点到为止，不做旁征博引和详细说明。

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信条是人的解放，恩格斯用《共产党宣言》归结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列宁主义最基本的信条是斯大林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列宁本人1920年12月10日回答西班牙代表团的提问时也说，“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马克思认为，必须以社会化大生产的高度发展和物质极大丰富为前提，因此只能发生在社会主义胚胎已经成熟的发达国家；列宁认为可以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经济较为落后的东方国家俄罗斯首先实现。

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进行和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解放只能是国际事业，一国单干必然成为笑柄；列宁主义则认为，可以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然后向世界输出革命。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当初所提也是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对少数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且只适用于国家消亡前的过渡时期。列宁公开主张的却是少数人（指俄国的产业工人）对多数人的专政，进而成为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并且“只要其他社会成分还没有服从于共产主义要求的条件，这一专政就将延续下去。”

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差别当然不止这些。对许多差别，过去说成是列宁的发展，现在看来并不妥当。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列宁熟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那

时已经公布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消灭私有财产和实行计划经济等，都是继承和坚守的。因此只能说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而不能说它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而且列宁在世时只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称谓，后来的列宁主义是斯大林的定义和系统化，还同马克思主义连成一个单词——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不断把自己的思想追加进去，使它实际上成了列宁斯大林主义。现在有些人为了替列宁开脱，把坏事完全推到斯大林头上。这不但不公正，也不合乎实际。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曾说，过去我们并不清楚。因为以往对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解，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现在要实行改革开放，这些当然都不适用了。不久后，邓小平又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才搞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实，这个说法并不解决问题，也不符合实际。因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近百年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比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要做的好得多。谈到消灭剥削，本来就没有真正得到实现，后来在改变公有制、大量吸收外资和实行混合所有制时已基本放弃了。至于“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则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社会主义中国两极分化的速度之快和程度之高，都大大超过西方国家。

在世界上，社会主义也是五花八门。据有人引证前瑞典首相帕尔梅的话说，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曾多达七十余个，遍布亚非欧拉美。如果按社会主义流派和它们的制度与政策区分，我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和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独立国家。这三类中以第三类最庞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些还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因素占优势）很难分，也容易变。不少国家是某个政党和领导人上台后宣布实行社会主义，下台后是否还在实行又不清楚了。

在对别国社会主义的承认上，恐怕最狭隘的还是共产党。它们主要不以社会经济状况和政治体制为标准，而只按意识形态的几项教条特别是领导人的主观意志来划分。例如，

瑞典等北欧国家社会主义因素再多，也被划入资本主义世界。朝鲜穷得再叮当响，统治再严酷，总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由于共产党实行个人崇拜的人治，所以一国的社会性质还往往由领导来定。例如斯大林一发脾气，南斯拉夫就变成了资本主义。赫鲁晓夫发点“善心”，它又变回了社会主义。匈牙利事件后，它被开除了，但过了几年就又变回来了。中国执行“一边倒”的内外政策，所以也紧跟苏联先后变了三四回。

这样看来，什么是社会主义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但是经过二百年的理论探索，近百年的社会实践，人们对社会主义总可以做出一点初步分析，得出一些初步结论了吧。根据近年来学界的讨论和个人的体会，我主张，社会主义起码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这样才能求得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实现公共产品的极大充实和人民生活的共同富裕。

（二）实行多种所有制的平等共存，以经济手段调节公民的收入和分配，逐渐做到劳动者的集体所有制占优势。

（三）高度的民主和法治化，政体上采用代议制和建立严格监督机制。

（四）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神圣不可侵犯。为此要做到：保障文明社会给予公民的一切自由，包括我国宪法上所没有载明的新闻、迁徙、罢工自由，以至免除恐惧的自由；彻底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和特权，实现公民在谋求利益和自身发展上的机会均等；建立充分体现博爱（人道主义与道德）精神和平等原则的社会福利制度。

以上四条也许有重复和遗漏，但无论如何都是一些重要标志，缺少一条也不能算是社会主义。■

二 和陈启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原所长）的通信

（一）陈启懋：忆何方——为纪念何方同志而作

2012年我把一篇论文稿“关于社会主义的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

义”请他把批评意见批注在原稿上退回以便修改。何方认真审读了此文并提出了很多重要意见。他回我的信中说，看到来信和文章“真有如见故人之感，心里实在太高兴了”。并说他按照我的要求，在原稿上批注了些随时想到的意见供参考。这里把他的批注中的重要观点概述如下：

(1) 1985年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全球化这个名词。特别是从1985年起，世界上兴起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两大潮流，此后不到10年，世界参与市场化的人口从不到1/5(只6亿)很快发展到近百分之百(近50亿)。中印两个人口大国就是在1992年前后从计划经济一下子变成了市场经济的。民主潮流也来势很猛，欧非在三五年内就化掉了，后卡在了叙利亚。

(2) 私有制和市场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三十多年来飞速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也合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所谓改革，就是变公有制为私有制(如从人民公社到归户经营)；所谓开放，就是参与全球市场化。

(3) 社会主义是人类长期以来对公平、正义的追求的憧憬。空想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和大同世界之类可追溯到奴隶社会。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描述也是属于高级乌托邦。这已是多数学者的定论。

(4) 《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消灭私有制”、实行两个“最彻底的决裂”(对“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是马恩在当时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更多地还是要追求的目标。无论是目的还是手段，都是脱离现实的。

(5) 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这段话去掉了有史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憧憬：正义(或公正)和公平。他说的这些，北欧国家已基本做到。北欧国家实行高额累进税，富人们也只好承担，所以社会稳定，没有闹过大的社会风潮。连英国，王震都说，“如果再加上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但北欧国家并不认为自己已实行社会主义。前瑞典首相伯尔梅讲，(几十年前)世界上当时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

家已有 70 多个，但他却把社会主义因素最多的瑞典排除在外。瑞典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一直认为瑞典仍属资本主义。

(6) 按马克思学说搞社会主义的（如苏联、东欧和毛时代的中国）都统统失败了。苏联没有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已被称为“政变”），也没有建成社会主义，试验了若干年，以人民受大罪和彻底失败告终。实践证明此路不通。

(7) 马克思学说的基本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国际主义，都大有问题，已基本上被各国党扬弃了。中国党从“十三大”起，已不再提国际主义，也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中国加上中国特色。朝鲜改称主体思想，都已不是原来了解的或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更是不同的两回事。马列主义书籍在朝鲜早已绝迹，且属禁书。

(8) 中国头三十年（毛管了二十七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是绝对倒退。除两弹一星之类个别技术，整个水平降低到连解放前都不如，单饿死人就是 4200 万，堪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与新民主主义的解释绝对相反。现在理论界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建立的是皇权专制主义，毛本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方毅首先提出）。其时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实无民主、自由可言。

(9) 由于毛泽东错误路线的耽搁，中国丧失了三十年的最好机遇，补偿起来得以百年计。要正视历史，吸取教训，无须掩盖错误，为尊者讳。

(10) 传统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家对经济的调节管理。所以前者又称自由资本主义，后者则为有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

(11) 反垄断法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制定的，为了保护自由竞争，非列宁说的帝国主义时代，但克服不了垄断。

(12) 跨国公司则是另一回事，它是经济国际化（以国家行为为主体）转化为全球化的主角。作为经济实体，约五十个左右的跨国公司，其实力已超过百余国家的实力。

(13) 二月革命尚未建立起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前，就发动少数以政变形式夺取了政权

并以暴力推动当时主观上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措施，跳过了民主革命和它应完成的任务，社会似乎前进更快了。但不管过多长时间还得回过头来补课，完成民主革命阶段没有完成的任务。苏联已经被迫退了回来，原参加苏联的国家现在都在分头补课了，偿还列斯为他们制造的灾难和落后。斯大林已被抛弃，列宁正在被抛弃。只是俄慢，其他国家（包括东欧）快而已。中国也将只得走回头路，实行宪政民主，中国党是逃不掉的。

（14）向社会主义过渡从共和国成立起就算。这是毛的原话，也是党史国史至今的正式提法。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所谓新民主主义阶段或时期。我一直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伪命题，只能骗人而不能实现。因为它的灵魂是共产党的领导，而一旦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民主（不论新旧），自然就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了。这不但是理论上的分析且为实际一再证明。

（1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新一轮民族独立运动高潮过去后，和平与发展时代已取代战争与革命时代，传统资本主义也已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把武装夺取政权说成是普遍规律是错误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已被多数党放弃，被他们从党纲党章中删掉了。第二国际（现在还可算存在）反对列宁的主要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当时就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党的专政，最后必然变成个人独裁。二战后的国际共运大多不再谈无产阶级专政了。现在大谈无产阶级专政可能使人感到奇怪了。

（16）中国历史上并无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个人独裁。中国苏区或解放区只有游民阶层，基本上没有无产阶级。那里发生的乱杀，就是游民头子（痞子）制造游民阶层互相残杀和杀害老实农民。

（17）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的发展是多种所有制和市场化的功劳，而不是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的功劳。

这是我与何方最后一次深入的交流。他的观点我基本上都同意，除个别例外。如我认为对新民主主义不能全盘否定。建国初期（1953年前）和建国前的解放区实行的就是新民主主义，还是比较成功的。但后来毛自己把它抛弃了。现在不得不回过头来补这个课。

（二）何方 2002 年 12 月致陈启懋信

1. 关于两种制度的趋同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各国、各种不同制度都有趋同倾向。例如几十年来两种不同制度趋同的结果（当然还有其他因素，特别是本身固有的发展趋势），就使西欧国家英、德、荷、比等国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因素增加到比社会主义中国多得多的程度，所以王震才说英国加上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共产主义。对西欧的社会主义影响，不但来自苏联，更多来自北欧。长此下去，可以肯定，西欧各国不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就已是现成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了。这也属于社会转型。

2. 关于中国迅速发展的动力：不宜全归于（我国）调整之功。私有制和市场化是中国三十多年来飞速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也合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所谓改革，就是变公有制为私有制（如从人民公社到归户经营）；所谓开放，就是参与全球市场化。邓在认识到这点后，提出的对策就是改革开放。

特别是 1985 年（这年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全球化”这个名词）起，世界上兴起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两大潮流。此后不到十年，使世界参与市场化的人口从不到五分之一（六亿）很快达到近百分之百（超过六十亿。中印两个人口大国就是在 1992 年前后从计划经济一下子变成了市场经济的）。民主潮流也来势很猛，欧、非在三五年内就化掉了。后卡在叙利亚。

3. 关于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因袭每一代领导人都要留下“创造”之例。从毛思想、邓理论、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这就是现在大学政治课的“邓三科”。属于“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之古训。我看没意思，连斯大林都没搞这一套。这是中国人的特色。

4. 关于如何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不只是正本清源，还在研究、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发明、创新、前进。社会主义是人类长期以来对公平正义追求的憧憬。空想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和大同世界之类可追溯到奴隶社会。

5. 关于共产主义：（对来信所引马克思说，到了共产主义阶段，“迫使人们奴隶般地

服从分工的现象已经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增长，一切社会财富的资源都会充分地涌现出来……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彻底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观点，社会才能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一段的旁注）马克思这段描述也是属于高级乌托邦。这已是多数学者的定论。

6. 关于《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消灭私有制”和“两个决裂”：更多地还是要追求的目标。《宣言》的原话是“在废除资产阶级建立在经济对立上面和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的占有”，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7. 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论两大科学发现：现在对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持否定态度的，在国际学术界（主要指国际共运中）已占多数。

8. 关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按马克思学说搞社会主义的（如苏联东欧和毛时代的中国）统统失败了。实践证明此路不通，马恩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国际主义，都大有问题，已基本被各国党扬弃了。中国党从十三大起不再提国际主义，之前就已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9. 关于上世纪的强大社会主义潮流：应该说多已失败。中国加上中国特色，朝鲜改称主体思想（马列书籍在朝鲜早已绝迹，且属非法），都已不再是原先了解的或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更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连我也公开著文论述过。

（三）何方 2013年4月15日致陈启懋信

1. 把马克思主义定为国家和社会的指导思想原本就不妥当。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学说，本身并非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原来就有也应该允许甚至提倡研究讨论，使其始终处于扬弃和发展过程。而一旦定为国教，实际上就是使其教条化、神秘化，也等于宣布其死亡。何况百余年的历史发展和实践已经和正在证明，马克思学说的一些主要论断并不妥当和行不大通，如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马克思学说的基础）、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全世界大约只有中国一个党仍坚持此说。连北朝鲜也早已放弃马克思主

义而代之以金日成父子创立的所谓“主体思想”。所传普列哈诺夫“遗嘱”中也说，如果马克思还活着，也会扬弃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搞革命输出、要各国都进行世界革命、坚持国际主义（这也是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早已放弃了了的口号，中国最后放弃于十三大），等等。因此早已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之说。坚持此论，只能误国误民。如坚持国际主义，就必然要输出革命、干涉别国内政；取消市场商品，只能天下大乱，等等。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应当从新研究，把它当作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学说，不应列入党章、宪法，成为强迫人们接受和遵守的宗教。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同他的说法与做法自相矛盾的，只是为了控制舆论和限制言论自由而在制造根据。例如他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并不十分清楚。既然不清楚，怎么能强迫人民坚持呢？所以马克思、恩格斯都一再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如果当作教条，连他们自己也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2. 至于列宁主义，只不过是一战前后从第二国际分裂出来的一个“左”的流派。一战使国际共运发生大分裂，伯恩斯坦为右；考茨基为中派，也称正统派；列宁为极左。列宁也只是长于谋略、善于权变，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一套理论。他的代表作也许就是《帝国主义论》。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中国的吃亏和落后就是上了此书的当，以为我们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帝国主义很快要垮台，“我们在座各位很快就会看到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实现”（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一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结果跟着犯了几十年的“左”倾错误，直到现在还得主要防“左”。所以《帝国主义论》不只是个过时不过时的问题，而且许多提法当时就不确切。列宁主要是对资本主义还有强盛的生命力估计不足，以为它已日薄西山，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我这一狂言乱语，在中央党校一时传闻很多。不知怎么搞的，竟然传到了陈云的耳朵，他大加批判，说“现在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见《陈云文集》第三卷最后一条）。

3. 毛泽东确乎和列宁（也包括斯大林）一样，不大讲什么原则，一切为了夺取和保持政权，实行专制独裁，以我为中心，对群众只讲专制（镇压），毫无民主自由可言。列宁

对西班牙工人代表团说过，我们不谈什么自由，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更是公然反对自由主义，和全人类普世价值相对立，致使中国人民奋斗近两个世纪，还看不到自由民主宪政法制的一线曙光。过去的多少志士仁人，为此死不瞑目。当代无数精英仍在为此奔走呼号，奋斗牺牲，但却依然是黑云压城。

4.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鲍彤起草“十三大”报告时的发明，这是他在最近一次聚会上说的。赵紫阳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自己后来也说，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因为直接提资本主义，中国人很难接受。赵在囚禁时期看了很多书，研究思考了很多问题，思想有了很大升华。我以为，在中国领导人中，赵的思想站在了最前面，超过耀邦，邓小平更不在话下。可惜他惨死在独裁的铁腕下，不但不能施展抱负，留下来的思想也只有那本《改革历程》。这不仅是他本人的悲剧，也是中国人的巨大损失。

三 关于两场革命——同台湾学者钱永祥谈话的提纲

谈所谓两场革命，一是俄国1917年革命，指二月革命和所谓“十月革命”，二是1949年中国革命。

（一）关于俄国革命

二月革命属于民主革命性质。1，具有自发的群众性；2，推翻了沙皇专制政权。就后一点而论，类似中国的辛亥革命。但在群众性和自由民主性方面超过辛亥革命。在推翻帝制走向共和上，两者是一致的。

“十月革命”已被俄国官方和舆论否定，改称“政变”，在历史上的定位是反动的，对二月革命开了倒车，取缔了自由，压制了民主，建立了一党专政，实行了个人独裁。

原来对“十月革命”称道的有两点：一是实现了工业化。实则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人民造成严重灾难，死伤无数，特别是农业集体化；也破坏了农业，长期得不到恢复；生态和资源的损失。二是打垮了希特勒，只有俄国可承担此任。有人说，没有“十月革命”也许不会有希特勒的侵略。还有人说，纳粹的侵略挽救了苏联和斯大林。对二战，苏称卫国

战争，反法西斯带有民主民族革命的性质。二战和一战的原则区别。一战及其结局阻碍历史前进。二战开辟了人类史上和平与发展新时代。经济与科技迅猛发展。大战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发生质变。社会主义试验完全失败。全球化和世界大同。民主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融合和趋同。

（二）关于中国革命

对中国革命的定性，仍在研究和考虑。初步想法，既不是民主革命，更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消灭了自由，扼杀了民主，其直接结果完全照搬十月革命。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和国家垄断。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意识形态上实行严格管理和舆论一律。使中国人民处于罐头内。从历史发展看，中国革命没有推动社会进步，而是促使其倒退。头30年，经济上人民生活绝对下降，政治上对生产的贡献是负增长。只是在牺牲农民和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实现了为工业化打基础，主要还是得益于苏联的援助。后30年，实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经济在付出过高代价的条件下才有快速发展。这主要是低人权和市场化。■

2010年10月27日

于万科自家

四 和许良英的通讯

良英同志：

十一月五日来信收到。信中提到前些年在李普家开会的事。可惜像李普这样一个好的同志竟于昨日驾鹤西归了，实在令人感到悲痛。

【宋以敏注：何方写此信前不久，刚刚参加了李普召集的多人参加的一个会。这个会是为落实李锐老的呼吁——应该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三个问题。】

我知道你的视力欠佳，所以回信的字尽量写得大些，便于阅读。本来想用毛笔写。但是一则我的毛笔字写不好，二则也太慢，于是只好仍然用圆珠笔了。对于你在视力欠佳的情况下还能继续写和读，实在敬佩。

现代简单谈一下来信提到的几个问题，也算交流看法。

一，对于收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大作，我完全同意应该弄清一些基本概念，我也相信讨论中人们的认识会逐步提高，这本身就有一定的启蒙作用。

二，我对李锐同志原来的想法开始就有点怀疑。一是写出这样基本能得到学界公认的书很不容易，二是写出后也很难出版，更不用说起教科书的作用了。而且也不应有垄断真理的想法。不过我还是做了积极的响应，写出我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想法。送李锐同志后没下文，我就作为我所写《自述》的结束语在香港出版了，书名叫作《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分上下两册。如果你们两位未曾看到，即寄一部送上请教。收到后请告一声。

【宋以敏注：《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一书的第十五章谈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几个理论问题的认识。这些篇章原本为回应李锐老所提的三个问题而写。此文送交李老后，长时间无下文，正好何方还在赶着改写他的自述，就把此文放进《何方自述》里去了。过了许久，李老有一次突然要何方把文章寄去。他是为把这几篇文章送交几位中央领导人一阅才再次向何方索要的。李老提出这三个问题时曾极力推崇张钦楠的新着《学习札记》。何方下面提及张书，源出于此。】

三，对于张钦楠同志的《学习札记》，我也有同感。对人类文明发展进行概括，是张钦楠同志力所不逮的。事实上，书写成后也再无大的动静。本书的毛病主要在用老的公式套历史，甚至还继续重复一些已被理论界基本上否定了的旧论断。正如你所说，不能再用唯物史观的老教条解说人类社会发展史了。不但古希腊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也不能说是经济基础决定的。六十年的历史。也不能说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毛泽东的瞎折腾就不是经济基础决定的，连经济基础也在他的折腾范围内。

四，我坚决反对辛子陵（还有谢韬）关于中国在提出三个代表、以民为本以后就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论断。他们对马克思、恩格斯、作了改装。其实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虽然恩格斯晚年对暴力革命的看法有所改变，但始终没有放弃，更不用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了。现在有不少人大讲恩格斯的晚年、宣传中国开始进入民主社会主义，都是不顾事实地明里暗里挺胡、温，把民主化或政改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我以为是不切实际的。

李锐同志的序我也不以为然。说毛泽东的“功高盖世”，是无限夸张。不说民主革命中所犯许多错误，就是对于建立“新中国”也应重新认识。这不是一场民主革命，而是以暴易暴，在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后，建立了更加严酷的专制制度和个人独裁，导致头30年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绝对下降，耽误了工业化和文明化的最佳机遇。更不用说给国家和人民制造的各种灾难了。从社会发展和历史进化看，“新中国”的建立不是进步，而是倒退。这一观点不知两位同意否？

五，《红岩儿女》第三部所载大作早已看到，并据后记所指引，还翻看了第一部所载有关浙大的记述。现在人老了。再翻看这类文字，仍不免热血沸腾。但也只能“一把辛酸泪了”。

胡绩伟和张宣三书均已有。可不劳寄。

寒冬已至，望两位多加珍重。■

何方

2010年11月9日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坚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刊原则。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邹行